

红旗

HONGQI



一九五九年

4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五九年第四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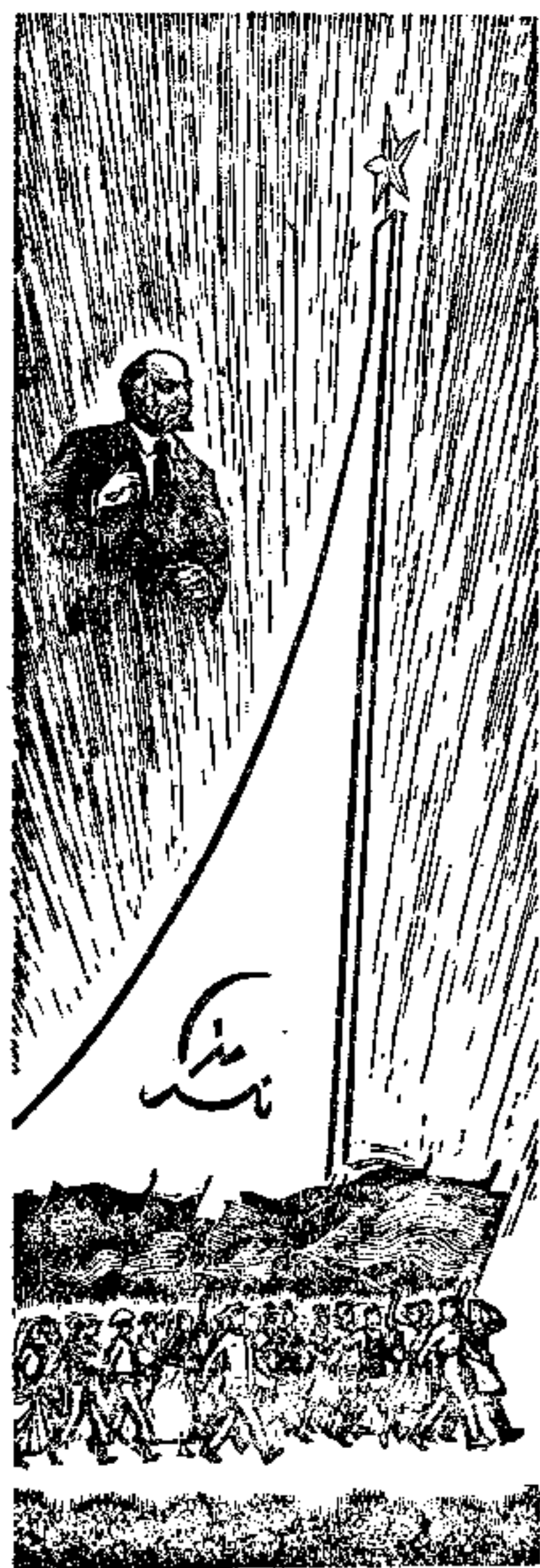
目 录

社論：向共产主义进軍的号角	(1)
論“全国一盘棋”	柯庆施 (9)
爭取今年夏季更大的丰收	譚震林 (13)
談干部当兵	楊成武 (21)
短 論 无限和有限的辯証法	艾思奇 (26)
正 确 地 对 待 規 章 制 度	陈茂仪 (28)
杜勒斯的童話和中国的真实	于兆力 (30)



——社 論——

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楊澄 苑英毅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吹起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这次大会向全世界宣告，苏联已经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千百年来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不久的将来就要在地球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代表大会，将作为人类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新的里程碑，记载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上。

四十多年来，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不但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彻底的胜利，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建设。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发展工农业和教育事业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措施，进行了反对反党集团和巩固党的团结的斗争，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和总结发言，以及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总结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苏联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宏伟纲领。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七年计划，正是这个纲领的最重要部分。

七年计划把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作为苏联今后一段时期的首要任务。赫鲁晓夫同志指出：“首先必须继续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有在我們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平，保证新的、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条件，下，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七年计划是一个向共产主



义过渡的科学计划，它规定以高速度发展生产，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一切部门的生产都要获得全面的发展。在苏联生产水平已经很高的基础上，计划中所规定的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是很高的，增产的绝对数量是很大的。苏联今后七年内工业总产值将增加百分之八十，总产值的这个增长部分将等于最近二十年所增长的产值。钢产量将要达到八千六百万吨到九千一百万吨。用于兴建和改建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企业的投资，要比过去三十年的投资还要多。七年内，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将增加百分之七十，保证充分满足居民对食品的需要和工业对原料的需要，并且保证国家对农产品的一切其他需要。七年内基本建设投资额，大约等于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全部年代的基本投资投资的总和。七年计划向苏联人民提出，要在最新科学技术基础上，建立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逐步实现国家的完全电气化，一切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尽量利用新的动力来源，利用十分丰富的天然资源，利用新的合成材料及其他材料，提高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技术水平，进一步改善生产组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人们从苏联全国各地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高潮中间不难看到，伟大的七年计划是一定要胜利实现的。现在，就连西方国家的某些资产阶级人士也不能否认苏联人民在满怀信心地前进。他们说，“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基调就是满怀信心”，苏联的“经济目标乍一看来似乎是大胆的和野心勃勃的，但是所要求的数字根本没有夸大。”尽管现在还有一些帝国主义的代言人，在那里说东道西，妄图贬低七年计划的伟大意义，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的叫嚣已经愈来愈没有市场了。

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不仅需要高度的物质技术基础，而且需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特别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主动性和积极性的重大意义，而且把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同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联系起来。为了到达共产主义，现在就要培养新的人，使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具有共产主义精神。因此，必须特别注重教育同生产、生活的有机联系，把劳动教育、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作为教育工作的中心。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还必须同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坐等资本主义的思想残余自行消灭。按照这样的方针培养出来的人才，将具有集体主义和勤劳的精神，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新社会道德的崇高原则的精神。这种新人的品质，同资产阶级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恰恰是一种明显的对照。

苏联的七年计划，使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经济竞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九五八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大大超过法国、英国和西德工业产值的总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已经赶上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七年计划的任务，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是“争取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生产中压倒资本主义体系，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保证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比拟的



优越性，社会主义各国間的团结互助，保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高速度的发展。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追求最大利润的原则支配着生产，财富的集中阻碍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新的生产技术往往找不到用武之地。它们的经济是不稳定的，是充满着矛盾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正在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国家之間正在日益走向四分五裂。可以断言，在苏联的七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加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体系不但在人心所向、增产速度等等方面，而且还将在物质生产方面，对资本主义体系取得压倒的优势。面对着这个前景，帝国主义的首脑美国垄断资本已经不再象两年以前那样对自己具有信心了。在一九五七年初，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里曾经吹嘘美国达到了繁荣的“空前高峰”，吹嘘“自由企业所特有的无限生动性”。而在今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却忧虑地提出例如“美国政府能永远存在下去吗？”这样的问题。“纽约时报”现在也公开承认，苏联经济今后每年增长百分之八点六以上是完全可靠的，而美国要保持每年增长百分之一点五都很困难。美国被苏联丢在“错车站”上的日子，肯定是不会很远了！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看到苏联的七年计划充满着爱好和平的精神。七年计划正确地反映了列宁主义的和平政策。七年计划的实现，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一定会起极其巨大的作用。赫鲁晓夫同志正确地指出：苏联、欧洲和亚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今后若干年内的经济计划的实现，将创造消除战争的现实可能，使战争不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手段。这是因为，当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强国，当中国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当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总产量超过世界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社会主义从各方面都压倒帝国主义，这种新的力量对比的情况，就会迫使帝国主义好战集团不得不放弃新的世界大战的计划。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还没有在地球上完全胜利以前，在资本主义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的时候，就会出现把世界大战从社会生活中消除掉的实际可能性。”当然，人们决不可以放松对于战争狂人的警惕。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说：“现在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不能轻视战争的危險。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都应当保持最大的警惕性，更加努力地保卫和平。”正当全世界的人们把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当成和平福音的时候，在大西洋的彼岸，却出现了一股新的战争叫嚣。有些过分狂热的美国军国主义的头子，竟然在谈论在最近两年内对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但是，只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斗争，就一定能够击破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战争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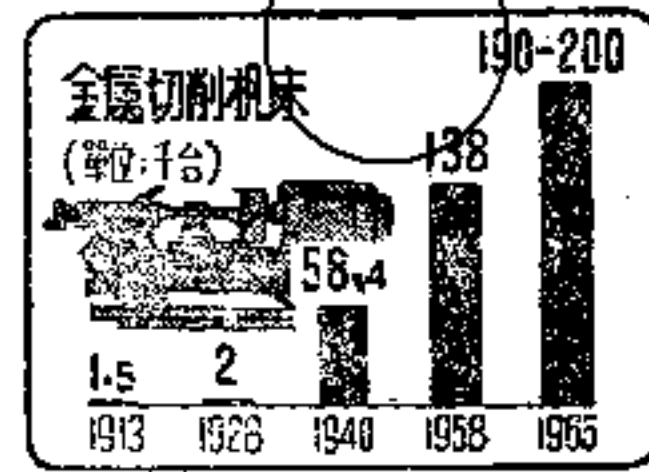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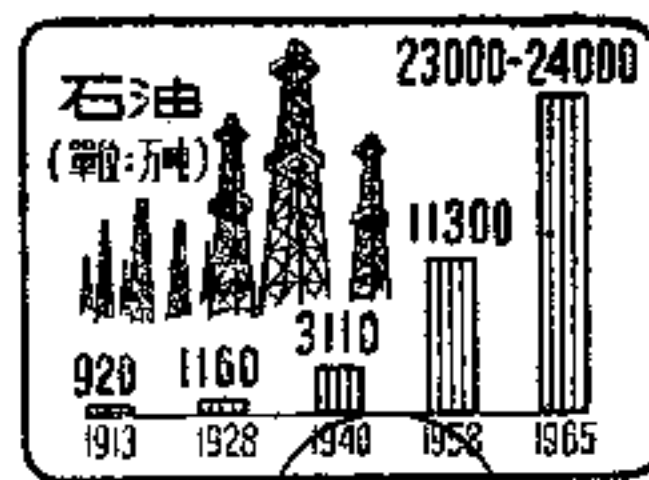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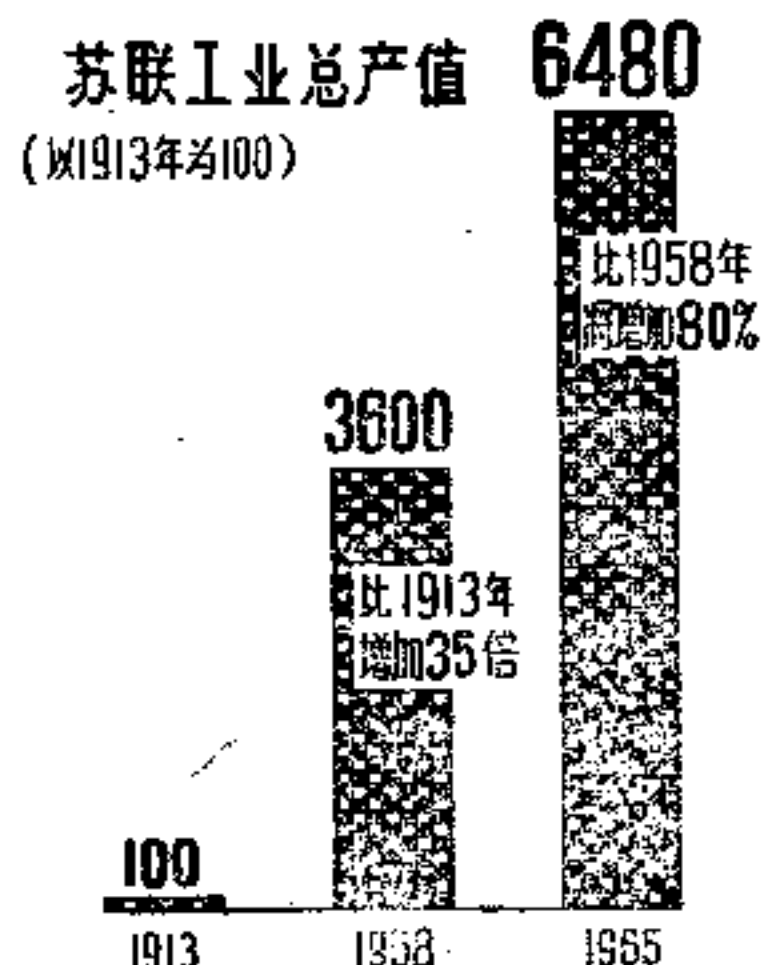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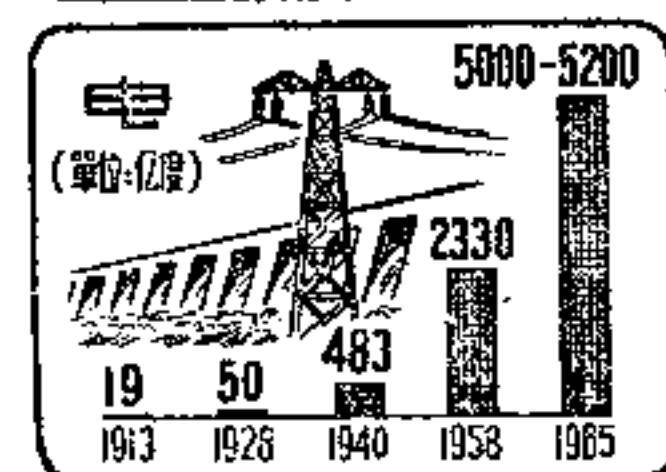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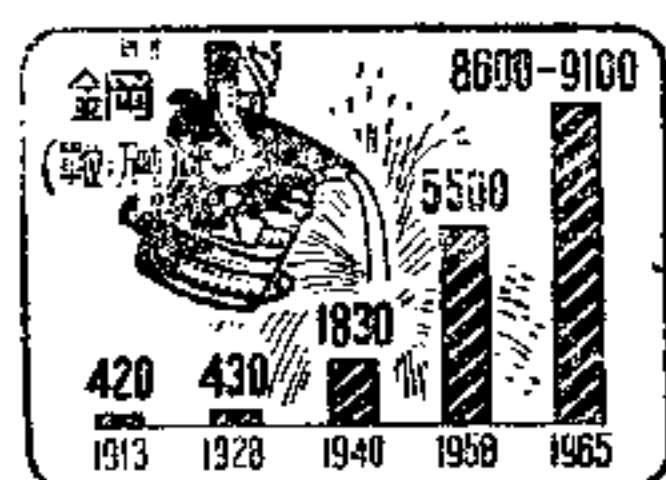
日暮途穷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愈来愈走向公开的独裁。在一些国家中发生了反动的武装政变。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反动派向他们发动了疯狂的进攻。但是，正如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转而采取了公开的独裁统治，这是它软弱的标志，是它无力以议会的方法继续维持其统治的标志。”同时，帝国主义反动派愈是疯狂地反对人民，就愈加撕破了资本主义“自



由民主”的假面具，就愈加从反面教育和组织人民进行反对反动派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人民群众也将真正地分清敌我，那些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社会民主党反共首领，也一定会逐步地被广大的工人群众所抛弃。在新的国际阶级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只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完全有可能击败国际反动派的进攻。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目前国际局势中的最迫切的几个问题提出了重大的建议。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强调缔结对德和约的必要，指出这是解决德国问题的根本办法，也是欧洲和平和世界和平的关键问题。代表大会认为，在远东和整个太平洋区域，应该消除由于美国侵略造成的紧张局势，建立和平地区，首先是建立无原子武器地区。大会还提出打破裁军问题僵局、禁止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试验、改善苏美关系、消除“冷战”和广泛发展世界贸易等一系列主张，这些都是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确保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重大贡献。全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热烈赞同和支持苏联的正义的立场。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关怀和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的讨论，又一次充分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衷心同情。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争取独立的民族，只有团结国内外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共同奋斗，才能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取得真正的胜利。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某些国家“实行反共政策不是团结民族力量，而是分裂民族力量，从而削弱整个民族在保护自己利益不受帝国主义侵犯时所作的努力”。美英帝国主义现在正在进行紧张的活动，企图使一些新取得独立的国家执行反共政策，以便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体进步人类对它们的同情，使它们在孤立和分裂的情况下落入帝国主义的陷阱。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及时地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形势，无疑对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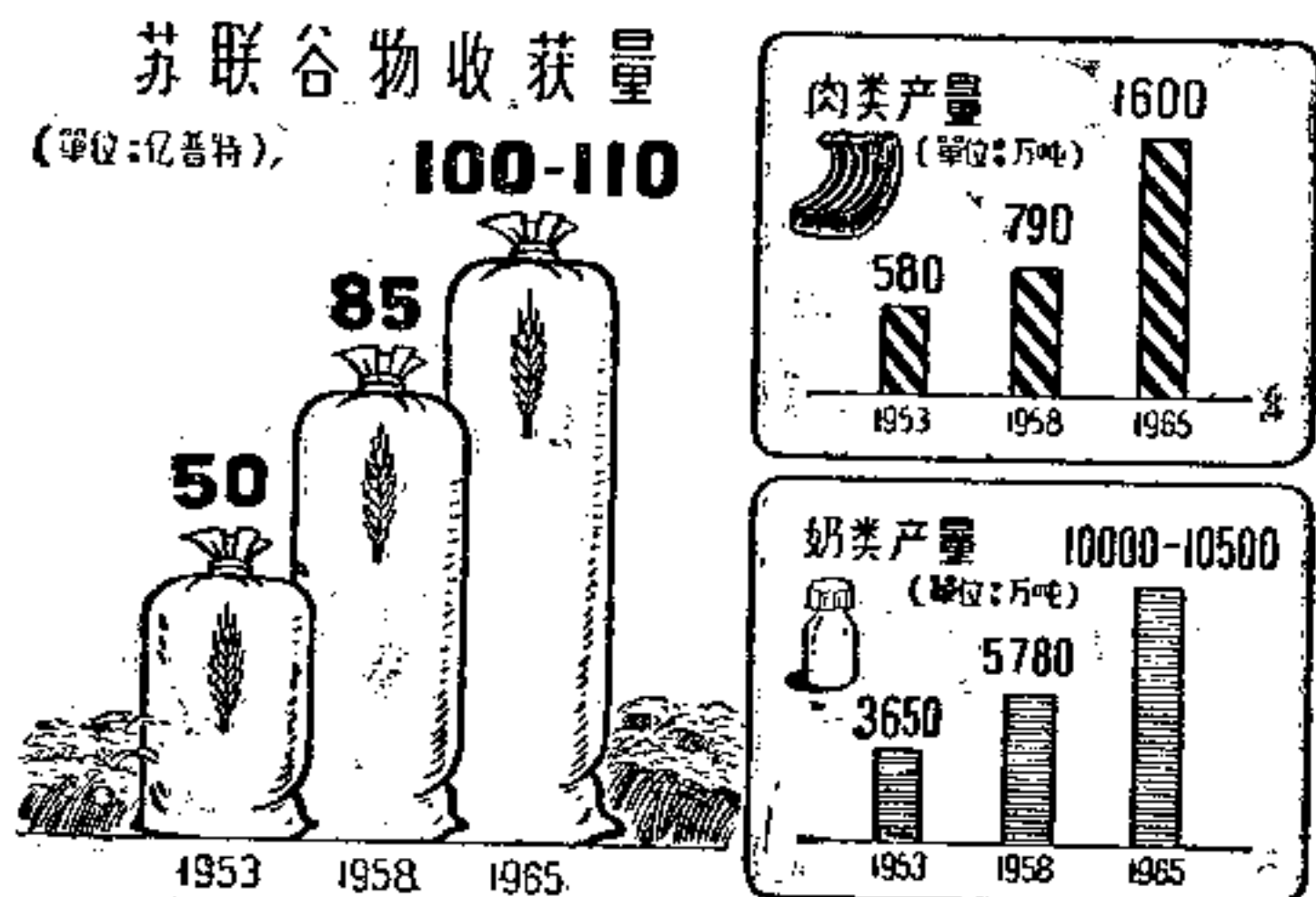
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历史时期。新的时期当然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要求在理论上加以解答。在这个方面，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决议和赫鲁晓夫同志报告中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若干问题的阐述，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问题，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最关心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社会发展不能够不经过社会主义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并没有一堵墙把它们截然分开。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许多共产主义特征，这些特征将不断发展和完善。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不断实现的，不能把逐渐过渡看作是某种缓慢的运动。必须反对匆忙草率地实行还没有成熟的东西，以免歪曲和败坏共产主义的事业。但是，也不能满足已经达到的成就而停滞不前。这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方针。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应该日臻完善。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出来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忽视高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企图在较低的生产水平上实行“平均共产主义”，无疑是错误的和必须纠正的。当然，如果把充分满足人们生活必需品的需要，看成一个过于遥远和漫长的过程，也是不对的。因为，满足人们的正常需要，并不是指满足人们奇怪的嗜好和对奢侈品的要求。根据苏联的情况，充分满足人们对食品、住宅、服装等等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

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详细地讨论了关于社会生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全体

成员中间分配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说明分配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而是派生的因素。分配的形式和原则，取决于生产方式和社会上生产的产品数量。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是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



朱育莲 繪

的。同时，在社会主义阶段，就已经有一部分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并不根据社会成员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伟大的列宁所称颂的“共产主义幼芽”，在苏联已经广泛地发展起来。这就是用优抚金、学生助学金、多子女母亲补贴费的形式，用学校、医院、幼儿园、托儿所、寄宿学校以及俱乐部、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机关的建筑费和经费的形式，进行免费分配。这是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重要前提。但是，按劳分配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分配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可以保证人们从物质利益上去关心劳动成果，对生产的发展仍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显然，不顾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群众觉悟的程度，企图过早地否认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不利的。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存在着“资产阶级式的权利”的残余，是不可避免的。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成为障碍的部分，将被逐步破除；而那些有用的部分，则还保留着，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这种残余才会完全消失。

赫鲁晓夫同志还着重指出逐步地使劳动成为人们的习惯、成为生活的内在需要的重要性。他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虽然劳动已经成为习惯，并且劳动时间将大大缩短，但是这个社会仍将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的、有条不紊的劳动者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将有计划有组织地分配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将考虑到生产过程的特点来对工作时间作社会性的调整。机器生产有一定的节奏，不对人的工作规定相应的秩序，要保持这种节奏是不可能的。”因此，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有必要进行劳动的分配，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想象为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错误的。

苏联共产党规划了苏联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式——集体农庄形式和全民形式的发展和接近的道路，认为这两种所有制形式的融合为一，是克服城乡之间本质差别这个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还提出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社会的政治组织、国家机构和管理问题。大会指出，国家机构在共产主义阶段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现在，苏联国家组织发展中的主要方向，是尽力扩展民主，吸收最广泛的群众来管理国家事务，吸引全体人民参加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领导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为了替帝国主义者效劳，大肆宣传社会主义的国家应该立即“消亡”。这样做，势必削弱和破坏社会主义事业。这种叛徒的立场，遭到了有力的揭穿和驳斥。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非常明显，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捍卫和平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任务，只有在帝国主义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消亡。

赫鲁晓夫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论断：“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可能性，将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帝国主义制度下，经



济和政治力量强大的国家，靠牺牲和剥削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薄弱的国家来取得自己的发展。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一种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真诚关系。原来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依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依靠合作和互助，迅速地使自己赶上去。这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就会逐步趋向平衡。这些国家象苏联一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间日益临近了。毫无疑问，这个预期，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赫鲁晓夫同志辩证地说明了世界各国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性的关系：在一切国家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道路上，主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而不是这些规律的特殊表现。同时，应当考虑到各国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因而产生许多独特性的东西。正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议宣言所指出的：各国共产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下面这两种倾向都必须反对：一种是忽视民族特点，因而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这就要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另一种是夸大了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这就要陷入修正主义的泥坑。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潮，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在实际上已经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别动队。各国共产主义者给了修正主义以致命打击。但是，修正主义还没有被彻底粉碎，还需要继续向它进行斗争。

正如赫鲁晓夫同志所说：“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表明了各兄弟党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会议的宣言得到所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一致的赞同，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国际主义团结的宪章。”在莫斯科会议以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一步加强了团结，每个共产党内部也进一步加强了团结。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同志精辟地指出，在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斗争、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生活、遵循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南这几点上，各国共产党人是沒有也不应该有分歧和不同的理解的。这些原则，也就是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所在。在这些原则面前，美国垄断资本家所豢养的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就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工人阶级叛徒的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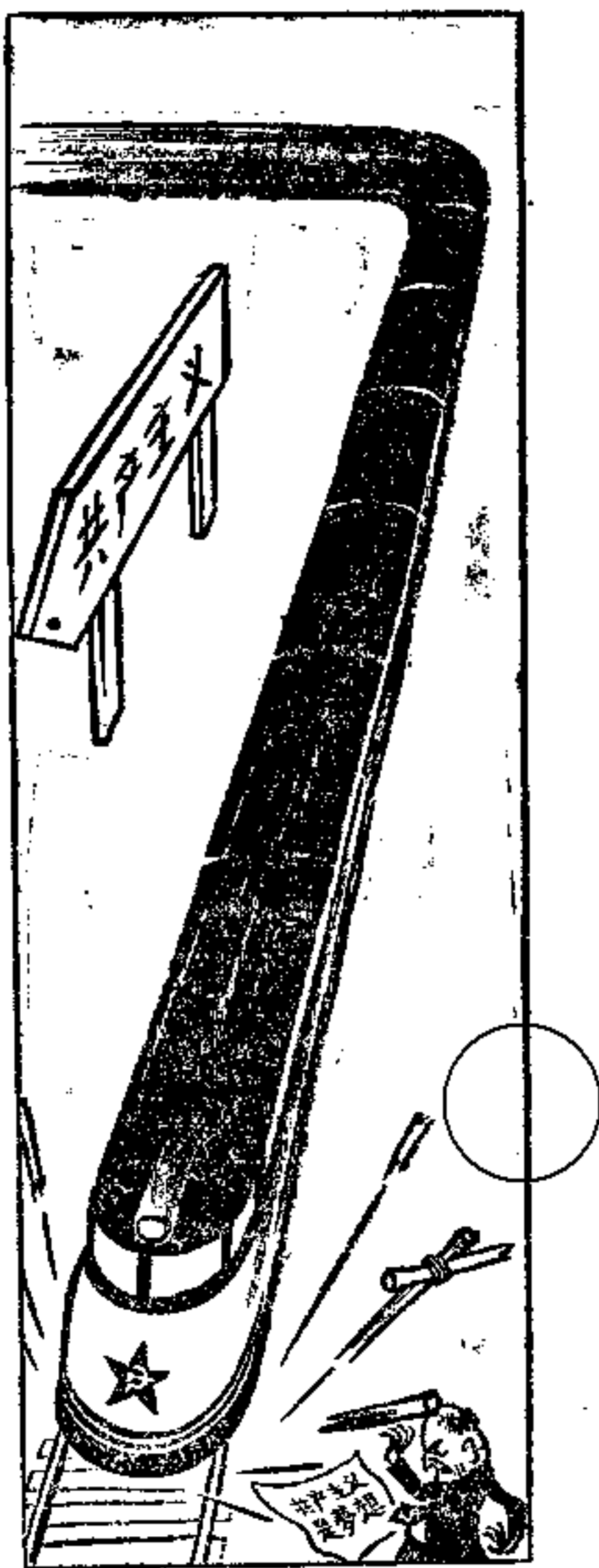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有力地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和修正主义者对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诬蔑，进一步阐明了莫斯科会议宣言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著名论点。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是完全平等自主的，同时，全世界共产党人又衷心地承认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说过，“帝国主义力量有个头，就是美国；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也必须有个头，这个



头就是苏联。”这是由于苏联首先为人类打开了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由于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由于苏联经过了一系列严酷的考验，证明了它无限地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始终不渝地遵循着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攀登共产主义高峰的第一支突击队。无疑地，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为实现七年计划而进行的胜利斗争的经验，必将进一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为了共同争取我们事业的胜利，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加强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我们最崇高的国际主义义务。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有力地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中苏友好合作关系的挑拨和破坏。赫鲁晓夫同志说得好，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要想在中苏之间寻找分歧，是不会有结果的；他们看不到这一点，正象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帝国主义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懂得世界上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一个完全是兄弟般的新型的国际关系。他们只知道尔虞我诈、你抢我夺、大鱼吃小鱼的国际关系。铁托集团用他们的“有奶便是娘”的市僧头脑，当然绝对不会懂得，我们中苏两党完全是同命运、共呼吸，我们是经过无数患难和斗争考验过的最亲密的战友，共同的理想和事业把我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中苏之间的团结分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坚持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学习，并且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两党之间的伟大的友谊而继续奋斗。

苏共第二十一代表大会是表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新的胜利、增强战斗团结的一次大会。通过这次大会，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要太久的时间，“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旗帜，就将飘扬在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天空。这面旗帜将以无限的力量吸引全世界劳动人民，震撼摇摇欲坠的帝国主义的统治。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吧，未来肯定是属于共产主义的！



吴 耘 画



“論全國一盤棋”

柯 庆 施



年年大跃进，一年胜一年，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的愿望。一九五九年是“苦战三年”中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一九五八年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钢、煤、粮、棉的四大跃进指标，和一九五九年社会主义建设继续用高速度发展的伟大规模。现在，一九五九年大跃进已经春云初展，全党全民的任务就是：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再接再厉地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有关的一整套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把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充分地结合起来，把中央的力量和地方的力量、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地结合起来，全党全民一致努力，保证今年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跃进计划胜利实现，而且力争超额完成。

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并不是新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生产斗争，不管是做哪种工作，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六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

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在目前时期以钢为纲和全面跃进相结合以及集中领导和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它们是互相联系的全国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同时，也只有如此，才不至于顾此失彼。一九五八年的伟大实践，证明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它的这一整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

当然，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需要随时具体调整 and 安排。这就必须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依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妥善处理。其中，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原材料和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物资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



由全国来统一安排。

大家知道，在軍事斗争中，必須集中优势兵力，打胜主要战役，才能解决敌我两方誰胜誰負的問題。同样的道理，在經濟工作中，也只有統籌全局，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計劃，集中人力、物力、財力，保證重点建設过关，才可以解决能不能更大跃进的問題。重点建設的成敗，不仅关系到全局的勝負，并且也影响到各个局部的命运。大局搞不好，小局也不可能搞好；大局胜利了，小局的問題也就容易解决了。特别是在我們这样一个大国，底子很薄，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經济，必須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財力于最关全局的方面，絕不能分散力量。凡是應該先行的必須先行，而在必要的情况下應該讓路而又可能讓路的則必須讓路，可緩办的一律緩办。我們應該認識到，根据分別主从、先后、輕重、緩急的精神制訂的国民經济計劃，正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經济所必需的。如果平均使用力量，主从、先后、輕重、緩急不分或者倒置，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甚至会使整个經濟工作迷失方向，出現經濟失調的危險。我們絕對不能允許这种失調的現象发生。至于“元帅”升帳了，“先行官”进軍了，而次要的、后行的方面，如果由于一时照顧不够，挤掉了一些不應該挤掉的，也会发生若干不适应的現象，这种情况也應該及早防止或者及时調整。但是这种个别的暂时的不适应現象，并不可怕，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全

局和整体的利益，片面強調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門的局部需要。

毛澤东同志曾經告訴我們：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我們的一些同志，作計劃、办事情、想問題，往往不善于从全国一盘棋的全局观点出发，不能把今天利益同明天利益、部分利益同整体利益相联結。其所以如此，是有認識根源的，这就是：头脑里的辯証法太少，形而上学太多，因而不善于用心思去想。形而上学的特点是：孤立地、片面地看問題，不把事物看成是相互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的；从表面現象看問題，不从本質看問題，从形式看問題，不从內容看問題；靜止地看問題，不是发展地看問題。用形而上学观点看問題的人，一叶蔽目，不知有天，很难正确地理解和处理小局和全局、重点和一般的关系，很难懂得它們是对立而又統一的，是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促进的；也很难懂得，大局和重点一般說来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解决矛盾。下列两个問題，就是用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很难想通的問題。

一个問題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观点，是不是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和各部門的积极性的發揮？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全国自全国，地方自地方，两者互不相干。然而，我們知道，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脫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



部构成的。全国的統一經濟計劃，即全国一盘棋的計劃，是把中央同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机动性統一起来的全局性的东西。全国的統一經濟計劃的完成，正有賴于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門的努力。全国好比是一个大交响乐团，中央是指揮，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門好比是这个乐团的乐手；全国的統一經濟計劃好比是一部交响乐乐章，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門好比是这个大乐章中的一段、一节或是乐器中的一种。完成全国的統一經濟計劃，正同演奏这个大乐章一样，需要全国各个乐手在总的指揮之下，运用自己的乐器和發揮自己的技巧。不听指揮，不按乐章演奏，演出是要失败的；沒有各个乐手的各自的努力和共同的配合，演出也同样是要失败的。我們儿时听见过提琴手或者其他乐手，只是由于听指揮、按乐章演奏，使得他的才能受了限制的事情呢？事实恰恰相反，“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正是由于听指揮、按乐章演奏，才更易于表現和提高他們的特长，使演出获得成功。我們国家今年的大跃进規模如此宏大，非常迫切地需要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門充分發揮积极性，各显神通；正如有了高明的导演、精采的剧本，还需要优秀的演員，有了高明的指揮、精采的乐章，还需要优秀的乐手一样。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全国一盘棋原則的积极性，从整体出发，把国家統一計劃和当地实际情况結合起来，更加鼓足干劲，努力創造

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計地力爭超額完成国家賦予的經濟任务。一种是脫离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則、只顧小局不顧大局的所謂“积极性”，实即盲动性。前一种积极性越大越好，后一种盲动性，則應該避免和克服。

是不是地方和部門的积极性，除了执行国家計劃以外，就沒有可能發揮潜力的余地呢？不是的。我們的国家計劃本来就是根据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的；因此，各个地方不仅在国家計劃之內，有很多事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办理，就是在国家計劃范围之外，只要无损于全局，而自己又有余力兴办的事业，也还可以兴办。重点项目如树干，一般项目是树枝，我們反对强枝弱干的做法，但是，只要不碍于树干的成长，枝叶茂盛当然并沒有什么不好。

另一个問題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不是地方的和各部门的机动就没有了？統一和机动，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依賴的。同时，經濟生活很复杂，我們的經驗又不够，任何一个經濟計劃只能反映出客觀經濟生活的主要的諸方面，不可能規定得十分周到、考虑得完备无缺。何况客觀的經濟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会出现在制訂計劃时所料想不到的新問題。这就必須有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發揮地方和各部门的主动性，来处理国家統一計劃中所未考虑到的問題，补充国家統一計劃之不足。所以，机动必須是为統



一服务的，必須服从于統一。反之，就会发展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妨害社会主义建設事业，造成异常严重的恶果。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届二次會議的政治报告中，曾經告訴我們：“地方工业的大发展，中小企业的大发展，必然带来許多新的我們現在还难于預料的問題。在这里需要特別指出：我們所提倡的地方工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在集中領導、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的发展，而不是盲目的、自由竞争的发展。为了防止和减少可能的資源資金的浪費和产品的积压，中央和地方各級都必須認真地加强协作和平衡的工作，必須坚决反对資本主义的經營思想和地方主义、本位主义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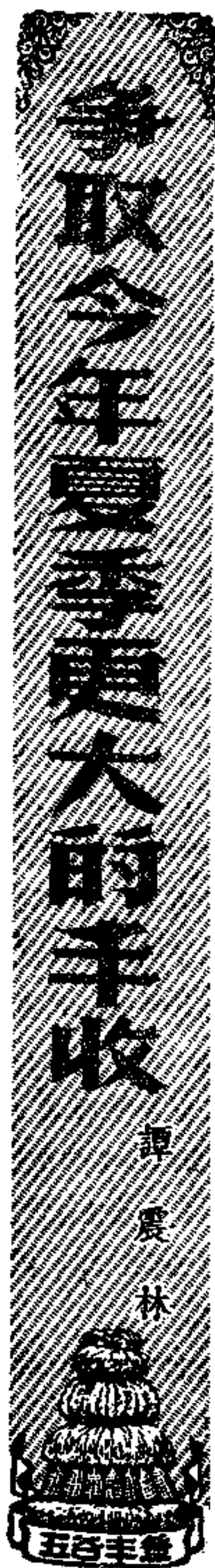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有沒有，或者够不够，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來說，具有严重的意义，这是考驗每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強弱的問題。大家知道，我們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應該是党和阶级的利益的具体代表者。党是社会主义經濟建設的領導者，而全国一盘棋的統一計劃，正是社会主义經濟的特点。識大体、顧大局，是党员應該具有的共产主义品質。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覺悟愈高，阶级立場愈坚定，自然会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問題，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反之，就会变成鼠目寸光，見树不見林的人，就会滋长危險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这是值得警惕的。

最近，上海市党組織在传达了党的八

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上海市党的二届代表大会決議之后，干部中正在热烈討論全国一盘棋的問題。在初步討論中，許多同志批判了一些不顧大局的本位主义的現象，并且初步認識到，在思想和行动中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則，不仅人不能尽其才，物不能尽其用，貨不能暢其流，妨碍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而且也為資產阶级思想对干部的侵蚀大开方便之門。我們認為，深入开展这一討論，对于上海的工作是很有好处的。

上海是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全年的国家的統一計劃中，上海担任着支援国家建設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教育，对于上海全体干部是迫切需要加强的。上海全体干部必須了解，上海工业生产的原材料和城市人民衣食所需的生活資料，主要是依靠全国各地的支援和供应，沒有全国各地的支援，上海是寸步难行的。但是，現在全国各地的原材料供应还是紧张的，我們必須千方百计地節約原料、制造代用品，以便减少全国各地的負担，防止和克服单纯依賴各地的懶汉作风。完成国家計劃，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利益。上海除了必須坚决地保証完成和超額完成国家赋予的任务以外，还要根据国家的統一規定，在物資、技术、資金等方面更多更好地支援全国各地。总之，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上海和全国各地必須更加广泛、更加紧密地开展共产主义的大协作，同心协力地为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大跃进計劃而斗争。





春季来临，万象更新，新的一年的农忙季节已经开始了。全国农民经过了一年的苦战，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之后，进行了短期的休整，又开始投入了新的战斗。一个比一九五八年规模更大的农业生产高潮即将迅速普及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各级领导机关，正在调整工作部署，把力量集中到争取今年夏季更大丰收的主攻方向来，打好第一仗，以保证超额完成全年的农业增产任务。

一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所提出的一九五九年的钢、煤、粮、棉的生产指标和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大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各级党委经过党代表大会、三级干部会等一系列的会议，对今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制定了全面规划，作出了具体部署。经过对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深入宣传和对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广大农民心情更加舒畅，干劲鼓得更足。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提出了为争取一九五九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十大倡议。目前全国农民正满怀信心地为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增产指标而进行着紧张的劳动。

当前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中心任务是抓紧第一季，争取今年夏季来个更大的丰收。这是

夺取全年胜利的第一关，也是保证今年大丰收的关键。一九五八年的大丰收是从夏季大丰收开始的，它曾经对全年大丰收起了决定的作用。去年夏收中，小麦试验田亩产几千斤的高产纪录连续出现，直接推动了早稻和早秋作物的大丰收，对晚稻和晚秋作物的大丰收也起了极为有利的影响。这一点，大家都是记忆犹新的。由于今年的粮食生产的任务比去年更大，争取今年来个更大的夏季丰收，也将比去年具有更大的意义。夏粮作物以小麦为主，如果小麦的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四百斤或六百斤，那么，三亿五千万亩冬小麦就能够收到一千四百亿斤到二千一百亿斤。这样，在我国以小麦和杂粮为主食地区的三亿五千多万人口，除了留下足够的种子和供应城市的工业用粮、副食用粮外，就完全可能使面食在整个口粮中占到很大的比重。此外，还可能留出一定数量的小



麦作为储备粮。如果加上计划播种的五千万亩春麦，也能得到同冬小麦一样的单位面积产量，那么，我们的日子就更好过了。对南方来说，争取早稻丰收，也有同样的意义。全国计划播种早稻的面积约一亿五千万亩，如果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到一千到一千五百斤，就可以收到一千五百亿到二千二百五十亿斤。我们抓好了第一季，就有可能使夏粮和早稻的总产量达到二千九百亿到四千三百五十亿斤。加上约七千万亩大麦、元麦、蚕豆、豌豆和薯类，就有可能接近或超过一九五七年的粮食总产量，而且主要是细粮。这就是说，抓好了第一季，就有可能解决全年的口粮问题；同时也必然会大大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推动秋季的更大丰收。所以，抓好了第一季，就可以使我们对于完成今年的农业增产任务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夏季丰收了，大面积的高额丰产出现了，我们才谈得到减少夏种和秋种面积，进一步来贯彻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

二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粮食要增产到一万零五亿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四十；皮棉要增产到一亿担，比去年增加近百分之五十。即粮食要增加三千亿斤，皮棉要增加三千三百万担。从单位面积产量来看，由于粮食播种面积缩小到十六亿亩左右，平均每亩产量必须达到六百六十斤；棉花播种面积计

划扩大一千多万亩，共达一亿亩，平均每亩皮棉也要达到一百斤。还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全国平均的数字。如果把可能发生的灾害损失、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工作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估计进去，那么，今年粮食作物亩产千斤以上的面积，就必须从去年占播种面积的百分之几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皮棉就必须有相当大的面积达到亩产一百五十斤以上，才能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农业增产任务。

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任务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上。今年不但要求粮棉大增产，而且要求农林牧副渔全线条大革命和社办工业的大发展。农业本身也必须发展更多的经济作物，特别是油料、麻类和糖料。油料的增产，应当使食用植物油比去年增加一倍，至少达到六百万吨。麻类的产量应当达到二千万担。否则就不能满足工业原料的需要，不能适应城市人民副食品的需要和全国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而为了发展这些方面的生产，就不能不从粮、棉生产方面抽出必要的劳动力。因此，每个劳动力今年所负担的生产任务，比一九五八年要大得多。整个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大大提高，才能适应今年更大跃进的要求。

我们还必须估计到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一九五八年遭受水旱灾害的面积约四亿亩，经过顽强的抗旱抢种斗争和防洪排涝斗争之后，仍然有一亿亩成灾。去年我国全部耕地面积不过十六亿多亩，受灾面





間苗 (速写)

李 樺

积达到四亿亩，成灾面积达到了一亿亩，当然不是一件小事，在往年就成歉年了。由于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才没有使人们的生活受到灾害的重大影响。一九五九年的天时条件如何，现在还难于预料。目前旱象已经露头，有的地方七个月没有下过雨雪，北方的雪也下得不足，许多地方冬季的气温也不稳定。今年出现一个和去年同样的甚至更大的水旱灾害，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

以上这些都说明，今年的农业生产任务比一九五八年更加艰巨。看不到这种艰巨性，以为粮棉指标都没有翻一番，就不是大跃进，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就可以不要再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要再苦战了，就可以不必运用去年曾经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了，这些想法是极端有害的。这往往是那些素来干劲就不足，但又善于空谈的人们的思想表现。这种思想如果不认

真加以克服，就有可能松懈群众的斗志，影响群众的干劲，妨碍我们农业生产的继续跃进。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要学会全面看问题，要善于区别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要善于抓住主要的和最本质的东西。在我们分析今年农业生产所处的形势的时候，必须估计到上述的困难。不注意到这一面，不认真去对待这些困难，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

我们必须认识，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从全局来说，形势比一九五八年更为有利。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为今年打下了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的基础。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是当前形势的最根本的特点。

今年的农业生产有些什么主要的和有利的条件呢？

首先是广大群众的觉悟更高了，干劲更足了。经过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实现，从经济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从而大大提高了群众觉悟。当然还有极少数的人仍然留恋着资本主义的道路，他们还在跟我们进行着斗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种斗争对于帮助群众提高警惕，提高觉悟，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都是有利的，是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经过一九五八年比较彻底地在建设速度问题



上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的障碍，我国农民摸到了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规律，这就进一步地解放了他们的思想，引起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重大变化。他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充满征服自然、迅速发展生产的信心。当前斗争的锋芒主要还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而且这个任务是长期的；但是斗争的结果总是会进一步地提高群众觉悟，鼓舞群众的干劲。一九五八年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使五亿农民把他们自己的命运进一步地跟社会主义的集体联系在一起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和集体福利的制度，割掉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尾巴，不仅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比过去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痛快，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放下了多少年来压在肩上的愁吃愁喝的千斤重担，大大提高了集体主义的觉悟，把全部精力集中到集体生产上来了。农民们说：“有了人民公社就有了铁饭碗。但是不搞好生产，铁饭碗就保不牢。”所有以上这些，必然进一步激发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其次，人民公社对于一九五九年的更大跃进，无疑将会发挥出比去年更加巨大的作用。去年人民公社一经建立，就立即投入了紧张的三秋运动和全民炼钢运动。没有人民公社，要完成那样繁重的任务是不能设想的。那时人民公社还刚刚搭起架子，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巩固，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在经过过去冬今春的整顿提高以后，它在今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中将

发挥其更大的优越性，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从农业生产所迫切需要的肥料和工具来说，在国家还不可能大量供应的时候，社办工业的发展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对于土化肥的要求，就可以实现农业的半机械化。社办工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就会大大提高公社的商品生产率，使人民公社经济活跃，腰杆子硬起来，不但能保证按月发工资，而且有力量来扩大再生产了。由于人民公社对劳动组织的进一步改善，生活集体化的实行，半机械化的逐步实现，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以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由过去所谓半劳动力变成一支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主力军，这都会大大发挥劳动潜力，成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少种高产多收的方针和增产的八项措施，经过去年一年的实践和斗争，已经在群众中确立下来了。这是关系我国农业生产高速发展的一件大事。去年虽然全国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倍，但是从八项措施所发挥的作用来说，还仅仅是初露锋芒。在去年，由于各项措施是随着人们认识过程的逐步发展而逐步增加上去的，不可能贯彻得很全面，很准确，尤其不可能作到互相结合；有些措施即使是看准了，但也不可能在当年就作好，或者在当年就能收到效益。例如深翻土地，去年上半年只有很少地方实行。在水利建设方面，去年成绩特别显著，但是所做的工程由于季节的限制，或渠道未及修筑、土地未及平整，



不少要在今年才能收到应有的效益。去年的夏收作物一般没有密植，秋收作物密植的程度也很不平衡。肥料方面，追肥不少，但是基肥一般不足。今年的情况就不同了。去冬播种的小麦约有百分之六十经过深翻，其中约有百分之十深翻到一尺五寸以上；播种量一般每亩都在三十斤左右，比前年增加了一倍；麦田基肥一般都在万斤以上，比往年增加了两三倍，并进行了几次追肥，也在万斤以上；普遍使用了良种；灌溉面积比去年扩大了一倍；而且大部分地区一开始就组织了专业队来进行田间管理。由于下了这样大的苦功夫，所以今年一般麦苗长的又密、又匀、又好，看来争取亩产千斤以上，并不是不可能的。人们对于八项措施的认识和运用，从不系统到系统，从不全面到全面，从不自觉到自觉，这是一个根本性质的变化。随着我们对于它掌握运用的熟练程度，它的威力必然越来越大。

第四，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各级领导机关

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党的六中全会对这些经验作了系统的总结，进一步武装了干部，提高了他们的领导水平。这对于今年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去年的实践中所创造的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种试验田，以生产领导生产，现场会议，检查评比，红旗竞赛，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等等方法，已被证明是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农业生产的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广大群众对这些领导方法是满意的，他们说：“党指到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这深刻地反映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在去年的生产运动中，我们的干部表现了无比的革命热情，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极为宝贵的。虽然有个别同志在秋收前后头脑有些发热，发生了某些浮夸现象，但是已经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就使我们更有根据地来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同时又可



春播（铜版画）

夏同光

系更加密切了。在去年的生产运动中，我们的干部表现了无比的革命热情，发挥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是极为宝贵的。虽然有个别同志在秋收前后头脑有些发热，发生了某些浮夸现象，但是已经受到了及时的纠正。这就使我们更有根据地来克服右倾保守思想，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同时又可



以避免因超越客觀实际而产生的盲目性，从而把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进一步地密切结合起来。我們說的鼓足干劲，既包括了革命热情，又包括了科学精神；既包括了苦干的积极性，又包括了巧干的創造性。有了苦干才能产生巧干；有了苦干和巧干相结合，苦干才能持久，巧干才能发展。去年我們各級领导的精力主要放在激发群众的苦干精神方面，这是正确的。因为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的时候，片面地强调巧干，就反而会束缚群众的手脚。但是，今年的情况已经不同了。毫无疑问，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我們一定能够领导群众既勇于苦干又善于巧干，把二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創造出更多更好的工作方法，以取得更加巨大的胜利。

以上这些有利条件，就是今年农业生产必然能够实现更大跃进的根据。这对于我們絕大多數同志說来，都是很清楚的。因此他們信心很大，干劲很足。他們正在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高举紅旗、鑼鼓喧天地投入新的一年的战斗。

但是应该看到，現在也还有一些这样的人，跟怀疑去年的大跃进一样，对今年的大跃进也抱着怀疑态度。他們由于看問題的方法不对头，看不到上面这些有利条件，嗅不到事物发展中的新鮮气息，极易接受觀潮派和算賬派所散布的影响，因而干劲不大，信心不足。这些同志的思想問題如果不迅速解决，就会貽誤时机，对今年的大跃进极为不利。

至于运动中的觀潮派和算賬派，他們不是什么思想方法問題，而是立場問題。他們站在少数富裕农民的立場，利用农业战綫进行休整、总结經驗的时机，散布錯誤意見，說什么“小麦丰收了沒有面吃，粮食增产了还要吃甘薯，大跃进靠不住”等等，企图制造混乱。他們的这种說法，当然是蒙蔽不了群众的。拿小麦來說，去年比前年增产了三百多亿斤，即增产三分之二以上，这当然是非常巨大的跃进。但是由于今年普遍推广密植，用种量大大增加，光留种子（包括預备种子）就比去年多留一倍多，占去了增产部分的一半左右。其余部分分給吃麦地区的人，平均每人不过比前年多得四十斤左右。由于小麦丰收，农村和城市有一个时期都多吃了一些白面。因此小麦虽然丰收了，面粉的供应目前仍然感觉不充足，要供应充足，还必须争取更大的增产。这絲毫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去年收获的甘薯，占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有些集中产地占到一半以上。薯类作主食虽然不如細粮，但是比过去許多地方粮食不足的情况却好多了。要在吃粮中提高細粮的比重而减低薯类的比重，就不能不多留一些細粮作种子，也就不能不暂时多吃一些甘薯。現在多吃一些甘薯，正是为了将来多吃細粮。群众都知道，去年并不是风調雨順的，相反，許多地方还是几十年未遇的旱灾年。只是由于大跃进，才大大縮小了灾情，不但沒有影响群众的生活，而且使生活有了改善。仅仅指出这



一点,就可以說明观潮派所說的“大跃进靠不住”是多么荒唐了。观潮派还想利用去年有些地方估产偏高的事实来否認大跃进的成績,这也是同样地荒謬。估产和实产之間通常是不免有距离的,有的偏高,有的偏低,去年的情况一般是偏低多于偏高。利用少数估产偏高的情况来否定去年的大跃进,这种錯誤是很明显的,是决不会得到广大群众的同情的。相反,广大群众将以更大的革命热情,用今年更大的成就来給这些观潮派以加倍的打击!

三

决定全局的是打好第一仗,是爭取今年夏季更大丰收。根据今年計劃,小麦的



积肥(木刻)

王衛生

平均每亩产量应当达到四百斤或六百斤。因此,必須爭取百分之五十左右的麦田亩产千斤以上,才能保証这个計劃的完成和超額完成。这就要求主要产麦区必須为亩产千斤的指标而奋斗。油菜籽和春播作物,也必須力爭大面积高額丰产。

今年冬小麦的基础已經打好了,关键在于今后五个月。如果我們再接再厉地进行严密的田間管理,及时追肥、澆水,抓住返青、拔节、揚花、抽穗、灌漿几个主要关键,使每亩能有四十万到六十万穗,每穗能有三十五个左右的麦粒,就完全可以达到亩产千斤。

爭取今年夏季更大的丰收,当前的主要关键是保証越冬作物的追肥和春播作物的基肥。必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实行肥料“挂帅”,开展一个人人动手、大家积肥的运动。去年的經驗証明,肥料来源是很多的,只要按照中央指示,大力积攒人畜粪便,熏肥、漚肥,大搞土化肥,增产綠肥,每亩地施上几万斤肥料是完全可以办到的。在开展积肥运动的同时,必須考虑到如何把大量的肥料根据作物需要及时地上到地里。这就要注意到提高肥料質量,改善积肥、造肥、运肥的方法,多搞土化肥,推广田头积肥,以确实保証农作物吃飽喝足。目前,全国的积肥运动已經轟轟烈烈开展起来了,許多地方提出了以大搞鋼鉄的劲头来大抓肥料。这是完全正确的,大家都应当这样做。

加强麦田和其他越冬作物的田間管



理。对每一块麦田和油菜等作物，都要象母亲抚育婴儿一样，让她该吃就吃，该喝就喝，吃得饱，喝得足，没病防病，有病及时治疗。为了做到这些，没有建立专业队的，必须迅速建立，做到每一块、每一垅，从种到收，都有专人负责，以争取亩亩高产，块块丰收。春播作物从种到收也应该如此，应当比小麦种得更好，做到普遍深耕，施足底肥，使用良种，合理密植。当前除了准备肥料以外，必须大力抓深翻土地，这是保证春播作物获得丰收的中心一环，丝毫也不能放松。同时，对春播的技术规格，也要因地制宜地及早制定出来，并提交群众讨论，保证种得及时，种得好。

根据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指标和农村现有劳动力的计算，今年必须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才能保证全部指标的实现。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折合成为全劳动力约有二亿二千万个。据初步估计，除用于经济作物、林牧副渔、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生活服务等方面以外，能用于粮食生产的不到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说，今年只有八千万个劳动力来担负一万多亿斤粮食的生产任务。因此，非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今年还不可能有大量的增加，因此主要的出路是合理安排劳力，改善劳动组织，改善劳动管理，改进耕作技术。这些方面都还大有文章可做。而最主要的出路还在于大搞工具改革。必须把工具改革的群众运动和专业制造密切结合

起来；必须把行之有效的改良工具迅速定型，大力推广；必须根据生产计划和劳动规划制定出今年的工具改革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这个运动系统地开展起来。当前的重点应该是结合积肥运动和春耕工作，大抓运输工具、深耕工具和提水工具，同时及早把夏收的收割、脱粒工具准备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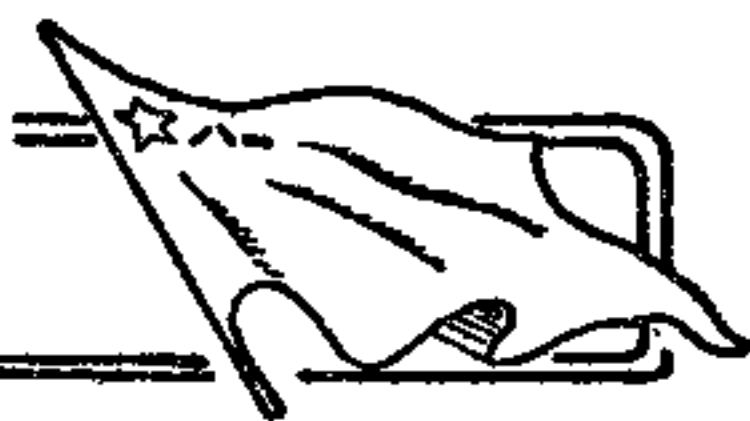
中央已经发出了开展以积肥为中心的春季生产运动的动员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战斗。全国农村各级干部，都应该象我们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组织一个战役一样，充满必胜的信心，而又严肃认真、谨慎周密地来组织这场争取夏季丰收的战斗。首先要对春耕准备和越冬作物的管理进行普遍检查，深入到每一个生产队和专业队，深入到每一块麦田和春地，看一看指标订得是否先进？措施是否跟得上？指标不够的要加码，措施不够的赶快加措施。进行麦苗排队，限期消灭三类苗和扑灭病虫害。对春季需用的各种工具都要普遍进行检查，该修补的修补，该添置的添置。要帮助每个生产队作好生产部署和生活安排，特别对于歉收地区和减产单位的群众的生活困难，要切实认真地予以解决。在进行以上这些工作的时候，都必须同时进行充分的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每一个战斗单位都有旺盛的士气和饱满的热情。

让全国各地各公社展开竞赛，看谁把红旗举得更高吧。让我们把一个比去年夏季丰收更大的胜利，来作为农业战线向我们伟大祖国国庆十周年的第一个献礼！



谈干部当兵

★ 楊 威 武 ★



毛澤东同志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去年九月二十日发出指示，把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定为制度。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措施，得到了广大官兵的热烈拥护。由于高级干部带头，作出了榜样，因而在全军很快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

对于干部当兵，特别是高级干部当兵，广大士兵群众感动很深，得到很大鼓舞。且听听战士们对党中央这一英明指示的歌颂吧：

自古军队分官兵，两种地位两颗心。
我军从来就平等，千年旧习一扫清。
现在干部又当兵，平等精神更是深。
干爱兵来兵尊干，亲密无间心连心。
翻破万年旧皇历，这桩事儿那里寻？
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领袖毛泽东！

的的确确，干部下连当兵，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作到。

剥削阶级的军队历来在官和兵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他们看来，官是贵重的，兵是卑贱的；官对兵有无上权

力，兵对官只有唯命是从。他们的官兵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

我军是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早在我军初创时期，毛澤东同志就把官兵一致，确定为我军的建军原则之一。几十年来，我们始终是以官兵一致的原则作为处理我军内部关系的根本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我军的官兵关系，是政治上平等的同志关系，只有分工和责任大小的不同，没有任何高贵和卑贱之分。

在我军的历史上，对于要不要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并不是没有斗争的。这是以毛澤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军从建军开始，在党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实行了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度，开展了官兵之间、上下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军阀主义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当时所处的残酷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官兵一致的原则体会得特别深刻。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地继承下来了。官兵之间始终是心心相连，生死与共，同心同德，紧密团结。这是我军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够克服种种困难，打败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取



得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

全国解放以后，我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军已从单一兵种建设成为现代化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曾有一个时期，在我军的建设上，有些人片面强调“正规化”，把我军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说成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不合正规化要求”等等。这些人借口“正规化”，借口提倡军官威信，发展个人权威，在军官和士兵之间人为地制造隔阂。这样做，势必削弱我们原有的官兵打成一片、平等相处的优良传统。经过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和整风运动，这种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广大干部、战士进一步地认识到，在我军新的建军阶段仍然必须发扬我军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党中央提出的干部当兵的指示，使我军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新的发展，为我军今后的建设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干部当兵，对于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加强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平等的观念，密切官兵关系，巩固部队团结有重大意义。

下连当兵的干部，遵循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改进思想作风，改善官兵关系作为首要目的。他们自觉地服从连长、排长、班长的领导和指挥，严格遵守连队的各种制度，外出请假，回来销假，礼节周到。他们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住一间房，同出操、上课，同娱乐，同劳动；打水、扫地、倒痰盂、掏厕所，什么都干，干得挺愉快。这些，看来是小事，但对于干部说来，能够彻底放下官架子却是一件大

事情，因为只有打掉官气，才能树立平等精神。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战士自调到炊事班以后，总觉得当炊事员不体面，三个月没有给爱人去信。但是在一位中将后勤部长到他们班当炊事员以后，他看到将军抢着作饭炒菜，给大家端菜端饭，深受感动，对别人说：“现在我感到炊事工作非常光荣了。”又有一次，部队集合耽误了时间，一个下连当兵的干部在队列里向带队的干部说了几句。当时，他觉得没有什么，别人也没有向他提意见。后来，他想：自己是一个列兵，有意见可以按组织提，怎么能当众质问首长？何况在队列里讲话就是不对的。他认识到自己没有放下官架子，仍以首长自居，是一个错误。当天下午，他在班务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不再犯。这一检讨，引起了战士们纷纷议论：“干部的共产主义风格就是高。”“我们要向干部学习，勇于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战士们从这些当兵的干部身上体会到我军官兵之间真正的平等关系，这是阶级友爱和同志的关系，是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

干部真正做到“思想当兵”，战士就会把干部当成知心朋友，当作亲人。我们下连当兵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验。战士们一有空就同我们谈家常、道身世，要我们讲战斗故事，红军传统，目前形势，共产主义社会远景。在吃饭时，他们往我们碗里夹菜。晚上天气稍冷，我们醒来时就发觉加盖了大衣。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你醒来悄悄地拿大衣给我盖，我醒来又悄悄地给你盖上。行军，抢着给我们背背包、扛枪。干活，不让我们干重活、脏活。同



战士们抬土，他们总是把土筐往自己身边拉。我们虽然一再表示锻炼自己的决心，战士们总是说：“同志，你们年纪大了，身体没有我们棒，不能同我们小伙子比啊！”为了放哨，要经过多次争取，才能得到班长的同意。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劳动，使我们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我们离开连队时，战士们一送再送，依依不舍，不少人洒泪而别。我们的战士实在可爱！我们下连当兵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士兵群众的那种纯朴、诚挚的感情，那种艰苦劳动、勤学苦练的精神，那种不怕困难、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深深地感动着我们。下连当兵，对于我们老同志来说，能从战士身上重温朴实深厚的工农感情，使我们变得更为坚强年青；对于一些缺乏锻炼的青年干部说来，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改造。这就是说，下连当兵，大大加强了干部的群众观念。事实证明，连队是一座很好的熔炉，下连当兵，能把我们熔炼

得更加坚强。下连当兵，使干部进一步認識官兵一致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大意义，并且深刻体会到这一问题对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军队是高度集中的战斗组织，要求所有成员必须按级服从，执行命令，听指挥，守纪律。干部当兵，官兵平等，会不会影响干部对部队的领导，松弛部队的纪律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的。不仅不会影响干部对部队的领导，松弛部队的纪律，而且可以加强干部对部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纪律。

我军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军队，我军的干部和士兵是站在同一立场，为实现同一个目标而努力的同志。能不能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站在群众之中来领导群众，是衡量我们干部共产主义觉悟高低的一个重要尺度。干部当了兵，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就使群众更爱戴干部，信赖干部，尊重干部，更自觉地、积极地执

行各种指示、命令。我军的纪律是建立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的。当兵的干部遵守纪律的模范行为，有效地提高了群众遵守纪律的自觉性。比如，班长是最基层的管理人，个别的士兵有时对班长不大尊重。干部当兵，编入班里，都很尊重班长，服从领导，这就巩固了班长的威信，从而促使曾经对班长不大尊重的人，自动进行检讨，并



将军下厨房

辰生



且改正缺点。这样看来，干部当兵是松弛了纪律，还是加强了纪律，不是很明显了吗？

干部当兵的过程是干部和战士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过程。

拜战士为师，无论是一般干部或高级干部都能够学到许多东西。战士们干劲冲天，说干就干，大跃进以来，训练、劳动都很紧张，从无倦色。战士们处处为国家节约，许多训练器材是自己动手制作的。为了更好地保卫祖国，战士们提出了“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豪迈口号，通过他们的勤学苦练，这一口号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战士们敢于破除迷信，大胆创造。以训练为中心的技术革新运动，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至于战士们深厚纯朴的阶级感情，更是动人。从战士们这些高贵的思想品质中，我们可以吸取巨大的力量，推动我们不断前进。我们还可以从战士那里学到有关技术装备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指挥员，既要具备必要的战略、战术知识，也要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特别是在目前部队的现代武器装备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要求指挥员具有一定的技术知识就更为迫切。下去的干部多是根据自己所管的业务或相近的专业到连队当兵的，他们跟战士同上课、同操作，虚心向战士学习，就熟悉了各种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和操作方法。这样，就可以加强部队技术训练的指导，并且使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更好地结合起来，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不同兵种的干部交叉当兵以后，能够使合成部队的指挥员更加了解和熟悉各兵种的特点，提高组织指挥

能力。“当兵一个月，胜读几年书”，是许多当过兵的干部的共同感受。

自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我军增加了大批的基层干部和新战士。他们都很年青，进取心强，热爱祖国，热爱军队。但他们实际斗争锻炼较少，对于我军的光荣历史、优良传统，缺乏亲身体验。当兵的干部作到平等待人，诚恳相处，尊敬干部，爱护同志，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密无间，这些实际行动，自然而然地会引起基层干部反躬自问：首长都能这样平等待人，爱护士兵，自己不这样作还行吗？也自然会引战士要求自己尊敬干部，热爱同志。这样一来，阶级情感更强烈了，革命大家庭更温暖了。现在，部队中尊敬干部、爱护士兵的动人事例不胜枚举，歌颂这些动人事例的诗歌处处皆是。请看看这首诗吧：

夜冷天寒北风急，班长下岗月兒西。
手拿针线灯下坐，为我熬夜补军衣。
针线缝在衣服上，情意缝在我心里。

这首诗不是把“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吗？

干部下连当兵，通过以身作则的模范行动去影响部队、带动部队，对部队的教育鼓舞很大。哪一个连队有当兵的干部，哪一个连队的学习情绪就更加饱满，政治空气就更加活跃，革命干劲就更加高涨。战士们觉得，许多当兵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年纪较大身体较弱，流过血负过伤，南征北战，对革命有很大的贡献，还这



样刻苦锻炼，自己不加倍鼓足干劲，超额完成任务还行吗？在战士中，普遍掀起了向老同志学习的热潮。有些战士的思想问题，也通过内心斗争自觉地解决了；个别进步较慢的同志，一跃而成为“五好战士”。基层干部普遍反映：“干部下连当兵以后，部队的问题少了，兵好带了，工作好作了。”

干部下连当兵，是我军领导方法上的一个创举。

我军历来都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才能不断跃进。现在，除了采取“走马观花”、“下马观花”、“种试验田”这些方法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外，又采取了干部下连当兵这种方法，就更加容易了解士兵的生活、学习和思想状况。站在一个士兵的地位看连队的领导，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从士兵的角度看领导机关的某些决定、指示、规章制度，有些缺点也比较容易发现，并且可以比较切合实际地加以改进。这比派人检查工作灵验得多。比如，某些连队开水桶不够的问题，已提出好久，还没有很好解决。干部当了兵，尝到了喝水困难的滋味，很快就解决了。由于我们离开连队生活时间长了，初到连队，处处感到生疏。班里的同志很关心我们，看到我们有不懂的地方，就一点一滴地加以帮助，我们感到很温暖。这就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新兵教育问题：对于刚放下锄头拿起枪杆的新同志，不能要求过急过高，应该耐心教育、帮助，处处关心、体贴，使他们感到部队温暖，他们就会更快地进

步。当兵期间，我们感觉到，有些工作权限过于集中，不大切合实际，使连队的工作有些被动；这就使我们认识到，在集中统一的原则下，某些工作权力必须适当下放，让连队干部能主动地安排工作，以利发挥干部和士兵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拿伙食问题来说，过去是以营为单位吃饭，连队干部不当家，人多吃不好。战士贴了许多大字报，要求以连为单位吃饭，但久久不见解决。干部当了兵，体会到群众意见的正确性，在一些连队试行修改。改了以后，连队干部发扬了老传统，亲自管家，同战士们一起研究改善伙食的办法，伙食的确好起来了，饭菜的质量都有提高，战士们皆大欢喜；而且更主要的是，加强了连队干部的爱兵观点，锻炼了管理能力。干部当了兵，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甘苦，就能够更深刻地了解群众的感受、要求和愿望。干部既能从领导角度考虑问题，又能从士兵角度考虑问题，就能避免思想方法的片面性，更全面地、准确地反映客观实际，能更好地使群众的智慧变成领导的智慧，使群众的经验变成领导的经验，使干部更加聪明，更有能力，使领导和群众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党中央提出的干部下连当兵的指示，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改造思想、改进作风的正确道路。干部下连当兵，就能够更好地了解群众，认识客观实际，克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能够更好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跃进，使我军的优良传统大大发扬起来。



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

艾 思 奇

宇宙是无限的，宇宙中的每一件事物却是有限的。无限的宇宙，由一件件有限的事物所构成。无限和有限的相互联系，两者之间对立的统一，这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之一。

人类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过去人们在神话中梦想的月宫旅行，现在竟接近事实了。行星际的飞行既然已离我们不远，太阳系以外的无限太空的遨游也就会有现实的可能性。但是，为着走向这些远大而美妙的目标，人们只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一步步地前进。从开始打制石器到火的发现，经过了多少万年，又几十万年才发明铁器。认识地圆，发现美洲，发明蒸汽机、电动机，直到最近人造地球卫星和人造行星的出现，又经过了几千年。人们征服自然的远景是无限的，但是到今天为止的成就终究是有限的。今天有限的成就不断地发展下去，就表现为将来征服自然的无限的能力。

我们常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多少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敌人！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国民党反动集团逃到了台湾。抗美援朝一战，迫使美帝国主义者不能不坐下来讲和。中国人民在掌握政权之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消灭了地主阶级，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战胜了资产阶级，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去年一年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的号召下，人民群众发挥了冲天干劲，创造了許多奇迹。出现了人民公社，粮食钢铁产量翻了一番。的确，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的。

但是，这个无限，仍然和有限联系着。在一定时间、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总有其一定的最大限度，而不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人用两脚走路，一点钟只能走十里左右，你不能希望他一点钟走一百里。用旧式农具种地，一个农民只能种几亩，不能希望他一个人耕种百亩千亩。组织起来，力量比单干大得多，但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仍有其最高限度。

既要深信人民群众力量的无穷无尽，又要注意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方面。能够这样，就是对辩证法的客观规律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因此也就掌握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正确的工作方法，正确地指导斗争、走向胜利的方法。

在战略上深信敌人的有穷有尽和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在战役、战斗上又认真注意到人民力量有穷有尽的方面，并巧于应用这有限的力量，帮助它发挥出可能发挥的最大作用，来一个一个地攻取敌人的堡垒，一次又一次地战胜敌人，如此积累下去，一直达到对敌人的全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曾经用以指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战斗的一个基本方法。

对自然界的战斗，也有类似的情形。自



自然界总的說來是无限的。但是，人們在和自然界斗争的一定过程中，在为实现工农业建設的一定任务而进行的斗争过程中，自然界所能給与人們的障碍和困难，一般來說总是有限的。与此相对說來，不断生长着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无限的。因此人民能克服一切困难，并有理由藐視一切困难。大地上有数不清的山，但阻碍着愚公的只是王屋山太行山，肯定地認識到山不会加高，愚公就有充分的信心，要利用自己子子孙孙无限生长的力量，来担走这不会生长的山。古代的人民中間，尙且有愚公移山的故事里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凌厉无前的气魄，在合作化、公社化以后大规模地組織起来的工农群众中間，在自觉地建設社会主义的今天的英雄人民中間，难道还会有什么自然界的困难值得害怕的么？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一旦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号召之后，立即得到了全国人民强烈的响应，并出現了一九五八年轟轟烈烈的全面大跃进的局面。

从总的方面來說，人民群众在对自然界的斗争中完全應該藐視一切困难，應該充分相信自己能克服一切困难，能完成任何艰巨的任务。但是还必须注意事情的另一面，即人民力量在一定時間、一定地点、一定条件下的有穷有尽方面。在这里，需要善于估計在一定的生产和建設任务中战斗着的人們所能發揮的最大的力量，善于根据这些估計来規定斗争任务和指标，善于把人民力量充分地組織起来和鼓舞起来，以便尽可能多快好省地完成所規定的任务和指标。

右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問題不仅在于他們只看到人民力量的有穷有

尽的方面，而看不到它的无穷无尽的方面，而且在于他們对于那有穷有尽的方面，也不是从它可能發揮的最大潛力方面来加以估計的。这样的人，只要一遇到比平常較大一些困难，精神上就被压倒了。因此就不能鼓起最大的干劲，来爭取完成可能完成的最大限度的任务。右傾保守主义者的思想方法和党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是完全相反的。大跃进的思想动力之一，就是深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深信人民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沒有不能完成的任务。我們必須繼續巩固和提高这种信心，繼續反对右傾保守主义，使我們在一九五九年的社会主义建設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跃进。但在这里，又必須同时防止陷入另一个片面的观点：仅仅一般地相信人民力量的无穷无尽，而看不見在一定的具体工作中人民力量的有穷有尽的方面，或者把这些有穷有尽的力量誤認為无穷无尽。这种片面观点也会造成工作中的錯誤或缺点：在規定任务时主观地提出超过现实可能性的过高的指标，在使用人民力量的时候不注意精打細算，合理分配，适当安排，改进技术，改革操作，一句話，不会節約劳力，不会使有限的劳动發揮它可能發揮的最大潛力。

必須認真学会掌握辯証法，把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統一規律应用到我們的生产和一切社会主义建設工作中。一方面要有藐視一切困难的冲天干劲，一方面又要有实事求是地根据客观现实可能性来正确地規定工作任务，正确地組織和应用人民力量的科学精神。任何一种片面思想都会使我們的工作陷入少慢差費的泥濘，只有辯証法的全面观点才能指導我們多快好省地向前跃进。



正确地对待规章制度

陈 茂 仪

一切工矿企业，为了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不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对这些规章制度的制订、执行、修改或者废除，都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任何一个环节采取轻率的态度都是有害的。

去年十二月六日，水利电力部北京修造厂发生了一次火灾，据初步估计，损失达七十万元左右。这次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有关人员违反了安全技术规程。这个厂的安全技术规程明文规定：干燥室内不准把干燥物件放在电炉热力线的铁篦子上。但是，一个组长在烘烤电机线圈的时候，却用木板垫电机线圈，并且把板凳腿放在地下电炉热力线的铁篦子上。结果木板凳腿成了火种，造成了北京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火灾。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工矿企业中的各种同技术有关的规章制度，只要是正确地反映了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是人们根据生产斗争经验的正确总结制定出来的，就必须严格遵守，不能违反。违反这种合理的规章制度，就必然引起事情的混乱，甚至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的损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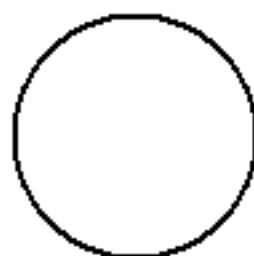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不是说一切规章制度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任何时候也不能改变。人们的生产斗争的实践不断向前发展，人们对自然的认识随着不断深化，逐步由不完全到比较完

全，由低级到比较高级，而反映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要求的那些规章制度，也就不能不适应这些变化而变化。有些在一定时期和一定条件下是正确的、合理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另一种条件下，可能变得不正确、不合理；曾经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可能变得妨碍生产力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生产实践的发展来不断地改进各种规章制度。墨守成规，在社会生活中是错误的，在生产实践中也是错误的。

一年以来，广大职工树立了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大破陈规旧章，创造了許多奇迹，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今后还应当鼓励广大职工进一步发扬这种精神，对于那些该破未破或者破得不彻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继续进行改革。

但是，改革既要大胆，又需要慎重，也就是说，需要革命热情和科学精神的密切结合。

一九五八年春天，党中央曾经指出：解放后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党中央还指出：要根据基层单位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



必須擬定一些新的適合需要的規章制度，在各個單位實行，也可以推廣到其他單位試行。總之，既必須放手發動群眾，又必須一切經過試驗。同年七月，黨中央又指出：要區別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兩種不同的規章制度，而對於有關生产技术方面的規章制度應當特別慎重對待。

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是關係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大事，必須嚴肅地進行。該破而不破，是右傾保守。不該破而亂破或者只破不立，是魯莽粗暴。無論前者或者后者，對我們的事業都是不利的。有些人不認真研究中央的指示，以為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就是要廢除一切現有規章制度，或者根本不要規章制度。這種對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輕率態度，顯然是應當堅決避免和糾正的。我們必須了解，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決不是要我們去違反客觀規律，去否認科學；恰恰相反，正是要使規章制度更好地反映客觀規律的要求，要我們更好地尊重科學。

改革規章制度，必須對現行的規章制度進行具體分析，善於區別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在這方面常常會發生不同意見的爭論，我們的任務不是避免這種爭論，而是要使這種爭論得到正確的結論。這裡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判斷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實踐論”中曾經指出：“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同樣，判斷有關技術的規章制度是否合理，只能是生產的

實踐。所以，我們必須堅決執行中央所提出的“一切經過試驗”的方針，堅持那些被生產實踐證明為合理的規章制度，修改那些被生產實踐證明為不合理的規章制度。

我們的各項規章制度，都是通過廣大群眾去貫徹執行的；哪一條不合理，哪一條應當如何改，必須有領導地發動群眾去討論。依靠群眾充分揭露矛盾，然後才能解決矛盾。在確定改革方案的時候，既要吸收生產工人在實踐中證明了的好經驗，又要吸收科學技術人員進行試驗和檢証；既要反對不認真對待合理化建議和科學技術改革的官僚主義態度，又要防止借口改革而否定那些合理的規章制度的混亂現象。總之，是從群眾中來，經過總結和提高，再到群眾中去。無論是破或者是立，都必須按照規定經過領導機關和主管技術部門批准。在沒有決定改革之前，對於原有的規章制度，仍須嚴格執行。

北京鐵路局在改革規章制度的過程中，曾經作出並且執行了這樣的規定：對於一些屬於基層規定的、對安全和質量沒有影響的陳規，由基層負責解決；對於一些屬於管理局和鐵道部規定的制度，基層可提出意見，但必須報上級批准；對於一些帶技術性的、比較重大的以及有關質量和安全的規章制度，必須經過試驗，證明可行，並且經過有關上級的批准，然後推行。這是一種對待規章制度的嚴肅態度。一切部門，一切單位，在改革過時了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建立新的規章制度的時候，都應當採取這種態度。

*

*

*



杜勒斯的童話和中国的真实

于 兆 力

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美国的一些反动的报纸杂志发表了一大堆文章，对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的国家中的大跃进，对中国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肆意地进行诋毁和诽谤。这一阵叫嚣很显然是由美国官方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首先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西雅图商会发表了一篇演说，演说中说，中国现在正在实行“大规模的奴役制度”，正在“建立一个巨大的奴隶国家”。他又说，中国的“古老而丰富的文化”，中国人民的“习惯和信仰，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受人尊敬的祖坟”，都在大跃进中被毁灭了，等等。这篇演说为在他的指挥棒下弹奏起来的各种乐器，定下了合奏的调门。以后，这个杜勒斯又针对中国发表了多次的演说和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月四日在旧金山发表的一篇演说，美国官方事先特别宣布，这是关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的演说。

美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政策”是什么，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其实用不着他们宣布，我们早已清楚了。在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前，美帝国主义者

用尽各种办法想把中国一口吞掉。在中国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又千方百计想要扼杀中国革命，扼杀新生的人民中国。站立起来了的中国人民，既不打算靠美帝国主义者吃饭，又不害怕帝国主义者任何威胁，一心一意地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愤恨和仇视。现在，中国人民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美帝国主义也就只好把诽谤和咒骂中国当做自己的“国家政策”，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中国人民在极大的欢乐中度过了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并且正在实现一九五九年的更大的跃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要求自由和进步的人民，都为我们的胜利感到高兴，如同我们中国人民为他们的胜利感到高兴一样。我们高兴，敌人伤心，这也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原来是在经济上极其落后的国家。在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一九五八年



的大跃进中的发展速度，更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梦想不到的。中国在一年中间使钢产量从五百多万吨一跃而为二千一百多万吨。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发展历史中，这是要好几年，以至几十年才能做到的事。

苏联四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现在苏联正在全面地展开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为迅速地赶上和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而努力。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都在高速度地前进。这一切使得全世界人民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跟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制度相对比，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更显得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

所以杜勒斯之流在咬牙切齿地咒骂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使社会生产发展得比资本主义制度快得多；他们只能用造谣和诽谤的方法来损害社会主义的名誉，来恐吓“自由世界”中的那些向往着自由的不自由的人民。

杜勒斯的经济学

杜勒斯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中说：“我认为，希望所有这些国家（读作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建设进展速度都象共产党国家那样迅速，那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必要的。”

“不切实际”——这倒不是假话。难道

可以设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接近死亡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使经济发展迅速得象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么？至于“不必要”，这话由杜勒斯先生说出来，却不能不使人想起那位望着高枝上的葡萄说它太酸的有名的狐狸了。

生产发展的速度，是新的社会制度能够战胜旧的社会制度的决定性的关键。资本主义制度曾经使生产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封建制度，所以战胜了封建制度。可是到了现在，跟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起来，资本主义已经是日趋没落的制度了。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够发展得这样快？为什么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停滞以至下降，并且无法逃避经济危机？在杜勒斯之流攻击中国的大跃进的时候，不能不接触到这个问题。果然，杜勒斯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答案。

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的演说中说：“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由于是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和集权主义的独裁国家，可以残酷无情地运用数学的和唯物主义的方程式实现迅速的基本建设。独裁制度把人类看作仅仅是有生命的质点，可以迫使他们工作到他们体力的极限。它能够把他们目前享受劳动果实权利剥夺到最大程度，只要保持他们进行劳动所需要的体力和精神。这种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而抽最低限度的部分供消费的做法，将有可能腾出巨额的过剩部分用于基本建设。”

那么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怎样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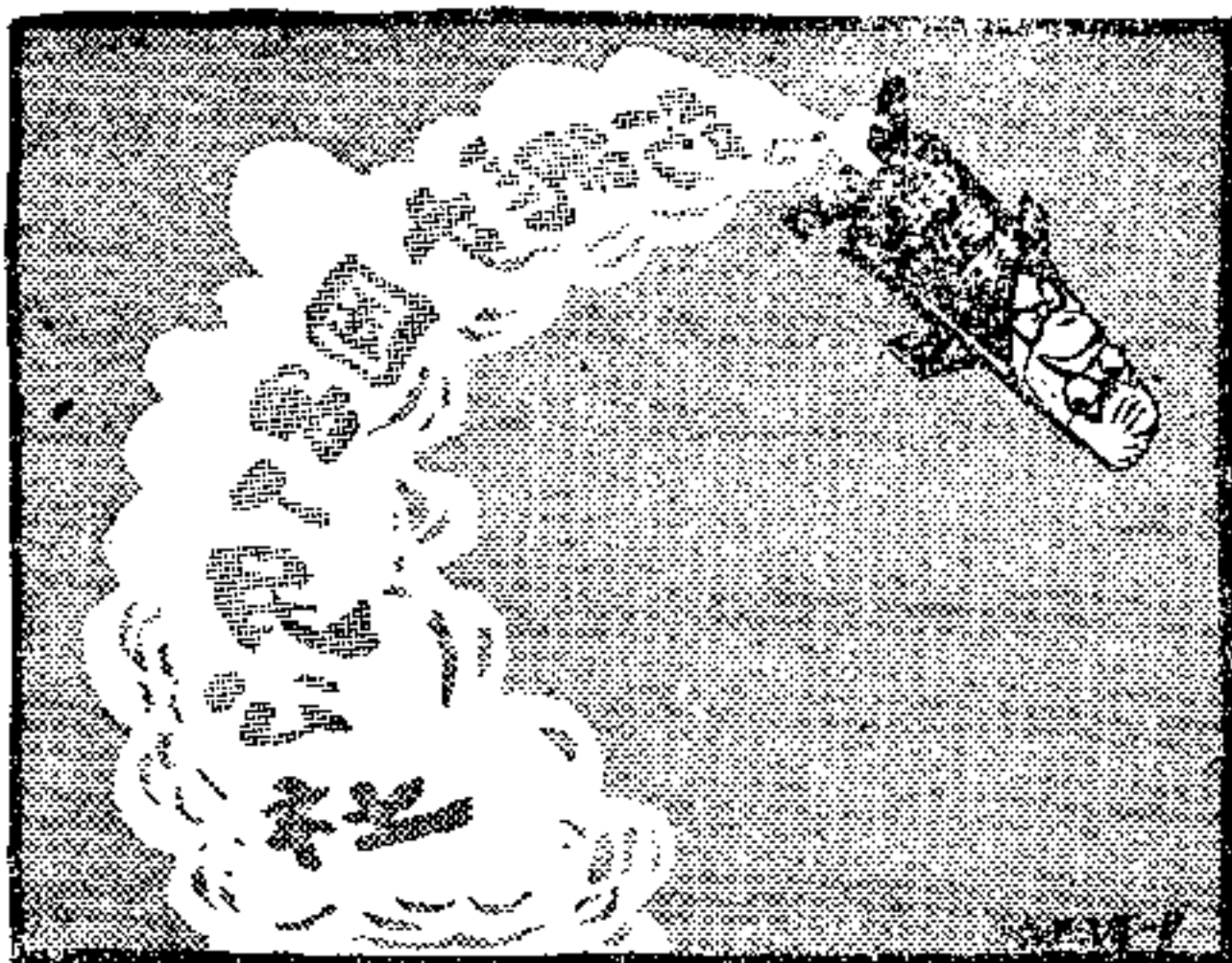


呢？杜勒斯說：“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通常劳动者的产品的大部分是他自己消費的，留下来供基本建設用的数額是不大的。”（杜勒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的講話）

这就是杜勒斯的哲学和經济学：万恶的共产党人，相信唯物主义，不相信上帝，残酷地剝削劳动人民，結果就有了生产的迅速发展。而那些可敬的垄断資本家，他們相信唯心主义，崇敬那万能的上帝（看来，这个上帝是不喜欢生产发展得快的），他們一片好心，讓劳动者消費掉产品的“大部分”，結果生产发展就只能很慢了。

根据这样的“理論”，杜勒斯得出結論說，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发展很快，但是“这样得到的成果，肯定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那么，反过来说，資本家們的心腸既然那么好，虽然得到了灭亡，也可以肯定“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光荣”了。

可惜杜勒斯的哲学和經济学掩盖不了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事实。如果美国一切企业中的“产品的大部分”都被劳动者消費掉了，那么，美国的那些亿万富豪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难道是杜勒斯的“上帝”凭空造出来的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一些最大的金融寡头家族所支配的巨大財富，



美国火箭，上不了天。

华斌

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封建王朝。象杜邦、摩根、梅隆、洛克菲勒等家族每年的收入，都相当于几万个工人，以至几十万工人的全年工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現在是世界最高的，但是美国的工人、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能够跟不劳动的資本家生活得一样好。也跟別的一切資本主义国家一样，美国的少数資本家占有了巨大財富，用来維持他們的穷奢极侈的生活，并且用来維持庞大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器。据估計，在美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和职員的收入，还占不到全部国民收入中的一半。因此，工人、农民过着跟美国的高度生产发展水平远不相适应的生活，而且失业和半失业的人数經常在一千万人以上。杜勒斯所謂資本主义积累率低是由于产品的大部分被劳动者消費掉了的童話，其真相就是如此。



在美国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百分比,的确比社会主义国家低得多。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情形来说,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平均每年是百分之十,在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八年甚至只有百分之二。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积累率低是因为劳动者消费得多的缘故,那么,在一九二九年以后的十年间,美国工人的生活应该是大大改善了。但是事实上,经过了一九二九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的资本家更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按照经济学家以美国官方统计材料为根据的估计,那时候,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只有一般生活水平所需的费用的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六十。由此可见,杜勒斯的一派胡言,无非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罪状推到劳动人民头上,并且为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准备借口罢了。

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究竟为什么不能够用更多的积累来扩大再生产呢?这当然不是因为资本家太善良,而正是因为资本家剥削得太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的手里;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大小,根据资本家的利益而决定。如果不能满足最大限度追逐利润的目的,资本家是不愿意增加积累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既然使得多数人民得不到足够的收入,甚至过着贫困的日子,社会购买力在许多国家里就往往不能继续增长,因而也就不能保证资本家的投资得到他们所要得到的利润。在这种情形下,不但扩

大再生产发生困难,而且连已有的企业设备也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各国近年来就是处于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九五八年,美国的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的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五,钢铁工业只有百分之六十,汽车工业只有百分之四十。英国的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利用率还不到百分之八十,炼钢能力约为百分之七十。西德的钢铁工业,也只有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生产能力被利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只能缓慢地爬行,甚至停滞倒退,而不可能迅速地向前发展。对于这点,应当说,杜勒斯是很懂得的,所以在他面对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跃进而发出的叫嚣中间,实际上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生产发展速度上只能落后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件命定了的事情。

外婆呢? 狼呢?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能够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呢,为什么能够象杜勒斯所看到的,用很大的积累来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呢?这不是因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没有改善,而恰恰是因为劳动人民已经不再受剥削,剥削制度已经消灭,一切生产资料都已经成为公有的缘故。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人民齐心协力地从事劳动生产,再也不需要用产品中的一个很大部分来供养地主、资本家老爷,而且也消除了 in 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巨大浪费,因此就能



够在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不断地增加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社会主义的生产是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目的而有计划地进行的，所以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中，完全用不着担心生产得“太多”。

我国的积累率，正如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的确是很高的。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平均每年接近百分之二十三。在一九五八年，工农业生产都有了成倍的增长，积累率当然会更高些。这样的积累不但没有妨害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且保证了将来生活水平还要更大地提高。我国现在的社会生产水平和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比解放前已经提高得很多了，但是比起在生产上先进的国家来，还差得很远。因此，我们还必须鼓起干劲，迅速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并且厉行节约，以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这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方针。杜勒斯之流看见我们实行这样的方针，很不开心，而且要破口大骂，这是人们早已料到的了。

帝国主义者一想到中国解放以前他们在中国为所欲为的好时光，的确免不得要伤心。那时候，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都爬在中国人民头上吮吸中国人民的血汗。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投资办企业，放债，巧取豪夺，所得到的利润是极其惊人的。单拿美国来说，据经济学家的估算，美国资本家在我国解放前几十年中间，一共拿了约五千万美元到中国来办企业，每年却有一

千五百万美元的利润汇回国内，（三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还有巨额的利润留在这些企业内，最后这些企业在中国还保有三亿美元的财产。（见魏子初著：“美帝在华经济侵略”）那时候，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无限紧张地辛勤劳动，他们劳动的成果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几乎百分之百都被迫奉献给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奉献给地主和其他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在那种时候，帝国主义的急先锋杜勒斯之流从来没有宣布中国是一个奴隶国家，也没有怜惜中国的劳动者消费得太少，相反，他们恨不得连中国劳动者的血都要吸干！

现在，杜勒斯先生忽然变得对中国人民十分仁慈起来了。据说，他之所以挺身而出咒骂中国的大跃进，完全是因为关心中国人民的缘故。他关心中国人民在大跃进中体力和精神消耗得太多，他关心中国人民消费得太少，积累得太多，以至不能享受自己的劳动的果实等等。

杜勒斯以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一定会把他不看成狼，而看成慈爱的外婆了。这个打扮成外婆的狼用悲天悯人的声调悲叹道：“共产主义制度可以多么残忍地利用人来发展工业！”（见杜勒斯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上的讲话）

亲爱的狼先生！你的话泄露了真象：你究竟是狼，而不是外婆。你的意思无非是希望中国人民放慢前进的步伐，不要紧张起来；你的意思无非是要中国人民少积累，



多消费，坐吃山空，只好回到向帝国主义讨乞过活的日子。这种日子对于你们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但是你们的这种黄金时代已经一去而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醒来，他们已经懂得，正是帝国主义者一百多年的压迫，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这样落后。要改变落后面目，就不能不紧张起来，勇往直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已经从残忍的剥削制度下解放了出来，开始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人们真正懂得了劳动的光荣意义和劳动的快乐。这一切当然是狼的头脑所永远不能设想的了。

好心肠的狼先生啊，这里没有什么要你来操心的事。大家都看到，美国对有些国家已经“援助”了好多年，结果只是使得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愈来愈贫困。美国的老爷们为什么不去关心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想办法使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一点呢？

何处是奴役制度？

按照杜勒斯的经济学，奴隶劳动被称为“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反而是“奴隶劳动”，因而社会主义就是“奴隶劳动”。“共产党国家大规模地使用奴隶劳动，它们抛弃了一切的家庭关系和我们认为的人类的尊严，以便把人们实际上变成了奴隶。”这是杜勒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话。

按照这个论点，这位美国的国务卿老爷就很热心地谈论中国的公社制度了。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他说：“中国共产党人正在把一种称为‘公社’制度的落后的大规模

奴役制度狂热地强加在六亿五千万大陆人民的身上。”十二月四日，他说：中国的“公社化计划是在全世界历史上没有前例的规模上牺牲人类尊严的奴隶劳动计划”，在中国的公社制度下，“个性和人格受到野蛮的压制”。十二月十七日，他又说：“在这种从一万人到五万人的居民集团中，家庭生活被摧毁，男人和女人被规定住在分开的兵营中，所有的人都遭到奴隶一样的对待。”如此等等。

杜勒斯老爷的这种议论在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舆论界”中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华盛顿邮报”说，“中国人象牛马一样被奴役着”，是“完全组织化的机器人的竞赛”。“时代周刊”说，人民公社是“把人当鸡鸭的庞大的养鸡场”。英国的“新闻纪事报”之类的报刊也跟着学舌，把中国说成是“奴隶国家”，是“一个蚁塚”。他们无非是说，中国的人民公社是奴隶制度，是强制劳动，是剥夺了个人自由，是破坏了家庭。总之，中国人民公社的罪状简直是大极了。

看了这些说法以后，如果以为杜勒斯之流真是分不清楚什么是奴役制度，什么不是奴役制度，那却是不公道的。

美国资产阶级具有对于奴役制度的丰富经验。他们曾经对于黑人实行了真正的奴隶制度。不过在九十多前，黑人在美国还是可以买卖、可以自由地杀戮的奴隶。美国的资产阶级是靠对于黑人的奴役而起家的。这种公开的奴隶制度只是在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的时候才被



废除。但是直到今天，美国的黑人群众仍然在政治上实际被剥夺了公民的许多正当权利，在社会上被排斥和歧视，在经济上被惨重地剥削，并且还要遭受野蛮的人身迫害。他们实际上仍然处于被奴役的地位。

不但是黑人，而且中国人在美国也曾处于奴隶劳动者的地位。那时，中国的穷人被贩运到了美国，做苦工。美国资产阶级依靠这种几乎毫无代价的劳动力进行了太平洋岸地区的开发。这也不过是七八十年以前的事情。

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固然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有所不同，但是工人阶级实际上也是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们在饥饿的逼迫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只好接受资本家所提出的任何条件。美国的垄断资本家对于如何强制工人实行紧张的劳动，提高劳动强度，是特别精明的。他们所运用的什么“福特制度”、“泰罗制度”、“血汗制度”，无非是把工人紧紧地束缚在机器上面，使他们一刻不松懈地为老板创造利润。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对本国劳动人民和对殖民地、附属国人民的最大规模的奴役制度。

在垄断资本家看来，只要达到剥削的目的，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奴役制度是不重要的。对于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帝国主义者决不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因为他们是属于同一血统的弟兄，是可以亲密地合作的。所以帝国主义在它的势力所及的地方，总是竭力保存原有的落后的奴役制度，以便利用这种制度来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来加强对人民

群众的剥削。

对于杜勒斯之流，是奴役制，就要加以维护；不是奴役制，就要反对。他们的原则从来是很清楚的。

他们之所以必须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就因为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他们的同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历史上的一切形式的奴役制度已经被彻底地消灭了。

对于奴役制度，现代中国人民也是具有丰富经验的。当然，我们的经验，和美国资本家不同，不是奴役人的经验，而是被奴役的经验。现在帝国主义报纸为了侮辱中国人民而特意选择出来的那些字眼，应当承认，在不很久以前，对我们还是用得上的：我们曾经被人当作“牛马”，任意地奴役；被人当作“鸡鸭”，任意地杀戮；被人当作“蚂蚁”，任意地践踏。奴役、杀戮、践踏我们的，就是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走狗。

但是，帝国主义老爷们大概用你们自己的眼睛也已经看到了，中国人民并没有甘心做牛马、做鸡鸭、做蚂蚁，终于在一九四九年作为独立的人而站起来了。

应当承认，对于最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在开始站立起来的时候，还不很了然究竟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出多少事情来。为了弄清楚这一点，需要一些时间。果然，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国人民就看清楚了，既然已经打碎了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镣铐，那么只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充分地发挥我们的干劲，充分地运用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就能够真正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

①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中国人民又創造了一个新的組織形式，就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組織进一步大規模地把中国人民組織起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群众自觉的运动。从来被認為“一盘散沙”的中国农民，在具有高度組織性的公社中集体地从事劳动，安排生活，这看来好象是奇迹。这种“奇迹”之所以可能产生，就是因为人們已經不是为任何主人而从事劳动，人們已經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并且懂得了，越是更好地組織起来，就越是能够有把握地开辟无限美好的将来。

这些的确是中国人民的新的經驗。既然对于中国人民說来，是新的經驗，那么，杜勒斯之流在一看到这些事情之后，要吓得目瞪口呆，更加胡說八道，那倒是很自然的。

自由、家庭和祖坟

說是組織了人民公社就不自由了嗎？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自由。剝削人、压迫人的自由，象以杜勒斯为代言人的美国大資產階級所高度地享有的那种自由，在我們这里当然是不能存在，也不能容許的。

資本主义制度也給工人以“自由”的。他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受資本家僱傭，如果不願意受雇呢，就可以自由地享受挨餓的滋味。除了这种挨餓的自由外，資產階級統治者竭力在劳动者中灌輸一种“个人自由”的觀念，这就是說，你能吃到一口飯，完全靠你自己的幸运，既然你今天有一口飯吃，就应当一心一意吃这口飯，不要管別人的閑事，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別人的飯也搶过来給自己吃。使劳动者抱着这种

自私自利的所謂个人自由的觀念，就是使他們不至于組織起来，进行解放自己的斗争，因而就逃不出資本主义的奴役。

中国的农民从前也有一种“自由”。当他們过着一盘散沙的个体經濟生活的时候，看起来好象是自由得很。但是保持这种自由，就使他們逃不出貧困和被压迫的地位，只是有利于爬在农民头上吸取农民血汗的一切反动势力。

人民为自己的共同利益而組織起来，并且建立起为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所必要的紀律，这并不是丧失了自由，而正是取得了真正的自由——再不受任何压迫、剝削的自由，再不受飢餓、灾荒的威胁的自由，用自己的力量来建設自己的新生活的自由。在为集体的事业而努力的中間，人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敏才智，并且实现各种和集体生活不相冲突的个人願望。对于从来处于被剝削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說来，这是真正实现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唯一道路。

据杜勒斯之流說来，破坏家庭和不崇拜祖先，也是中国人民公社的一条罪名。的确，中国人民破坏了一个封建的家长制。这种家长制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一般早已沒有了，这是資本主义的一个进步。但是我們在破坏封建家长制的同时，还建立了民主团結的家庭，这在資本主义社会一般也是少有的。作为美国政府負責人的杜勒斯先生，与其关心中国的家庭，还不如关心一下美国的家庭生活吧。美国的作家斯科特·尼尔林夫妇一九五五年出版了“今日美国”一書，在这本書的“美国社会的腐朽”



的一章內，特別敘述到美国家庭的“不稳定和不安全”。作者这样描写道：

“十来岁的少年同他們的父母之間的紧张关系，以及同一家庭中各个少年成員之間的相互紧张关系，在美国近三十年来已是司空見慣了。这种紧张关系已經发展到存在于不滿十岁的小孩和他們的父母之間。在成年人之間，特別是夫妻之間，紧张关系最可以用离婚案件的迅速增多来判断。

一九〇〇年美国有一千六百万戶人家，有五万五千起离婚案件，一九四八年有四千万戶人家，有四十万八千起离婚案件。戶数增加一倍半而离婚案件增加了六倍多。美国人的基本社会建筑材料——家庭，是很松懈地結合在一起的，以至看来好象就要垮台散伙的样子。”（該書中譯本69—70頁）

尼尔林夫妇的著作中繼續分析在美国生活方式下的兒童教育問題，他們說：

“今天美国家庭在个人主义和无社会性方面是发展到了极点的。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他們的任性和个人主义，已使得他們集体地行动成为困难的或不可能的。……在人多拥挤的学校里，要維持紀律比在沒有人照管和照管得不好的家庭里更为困难。有許多这样的事例：学校财产被破坏，教員遭到恐吓，少年帮会进行敲榨、勒索、毆打、偷盜、搶劫、强奸和暗杀。他們进行派別斗争和帮

会之战。……教育部門、执法官員和立法机构都在調查和討論正在全国範圍內日漸增多的‘少年犯罪’。”（同上書，75—76頁）

尼尔林的書中所描写的这种情形，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关系和兒童教养早已成为严重的問題，甚至在有些美国資產階級的社会学家、教育家的有关論述中，也忧心忡忡地談到这一点。

我們在这里不想来討論美国的家庭問題。我們要說的是：人民公社并不会使中国的家庭“毁灭”，而且我們的家庭决不会走到資本主义的这种可怕的道路上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国人民能够有真正幸福的家庭。

中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过去無論是在劳动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以一家一戶为一个独立的单位。現在人們参加了集体的劳动，有了丰富的社会生活，这的确是不小的改变。使得杜勒斯之流失望的是，中国的父母子女仍然享有自己的家庭，并



“亲爱的，我多么爱你們啊！我有責任要保护你們……”

米 谷



沒有拆散开来，生活在杜勒斯所幻想的兵营里面。不过这种家庭，已經跟旧社会人們所习惯的家庭有了根本的改变。家庭不再是人們的貧困的囚籠，人們的眼界不再束縛在一个家庭的范围以內，妇女在家庭中的卑微地位已經結束。这种变化是中国的劳动人民开始走上富庶和文明的生活的标志之一。使得杜勒斯先生們大惊小怪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过去中国农家的坟墓都是一个个分散着的，占去了不少的耕地。現在人們把这些坟墓集中起来，建立公墓制度，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公社社員們的这个举动沒有惊动地下的亡魂，但是居然惊动了美国的国务卿先生，出来冒充这些亡魂的律师！

还是讓杜勒斯的同胞出来答复吧。美国“斯通周刊”的一篇評論，对于杜勒斯这个冒牌律师发表了一篇評論。評論写道：“这位国务卿用一种几乎是孔夫子式的憤怒口吻說：‘神圣的祖先的坟墓正在到处受到褻瀆’。遺憾的是，他沒有順着这种脉絡繼續談下去。其实，日益衰落的岂止崇敬祖先的风气而已。在中国，現在新郎和新娘不算八字就結婚，不看风水就修房屋，这种蔑視天老爷的做法迟早一定要使这个政权垮台的。”

杜勒斯的上帝一定要我們的国家垮台，我們只好等着。但是杜勒斯先生居然想邀請我們的祖先参加反对人民公社的十字軍，他就沒有想想，如果我們的祖先看到自己的子孙的事业一天天兴旺起来，該多么高兴！

太平洋上的波涛

当然，不能以为，美国的国务卿愚蠢到只知道关心中国人的祖先的坟墓。他的眼光的确要比这远大一些。他看出来，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要“使中国迅速地变成一个軍事和工业强国”。杜勒斯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演說和十二月十七日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的演說中都着重地說到这一点。可以想見，杜勒斯在說到这一点的时候，掩盖不住他內心的恐慌。

是的，使中国变成一个現代工业化的强国，变成一个再也不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强国，变成一个能够充分利用在本国的广大国土上的丰富資源以造福于人民的工业化的国家，这正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的願望。这个願望，現在正在迅速地变成现实，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对于世界难道有什么坏处么？

美国的“时代周刊”特別引用了拿破仑的話，“讓中国沉睡吧。当它醒来时，世界就会陷于不幸。”的确，中国是醒来了。因此，据說，“世界上大多数人如果没有感到不幸的話，都已經感到不安了”。事实上，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翻过身来，对于全世界絕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来說，只会感到鼓舞，决不会感到不安。杜勒斯之流硬說，中国的大跃进，首先就是对亚非友邻国家的“威胁”。但是这些国家或者摆脱殖民地地位还不久，或者还在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它們正在力求实现



彻底的民族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中国的例子只是增加了它们对于前途的信心，它们决不会相信杜勒斯之流的鬼话。中国同友邻国家的关系，严格遵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根本利益的冲突。中国人民认为，亚非友邻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经济繁荣，也就是我们的利益。友邻国家富强了，我们就高兴；友邻国家贫困了，我们就不安。这些友邻国家也同样地看待中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杜勒斯象煞有介事地捏造中国对外“倾销”的谣言。任何人都知道，中国有十分广大的国内市场，随着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的需要一定愈来愈增加，而且已经愈来愈增加了。任何人也都知道，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满足这个愈来愈增加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对于我们是一项何等繁重的任务。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对外倾销，这是对社会主义极其不利的，我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不允许这样做，而且我国的经济力量也不允许这样做。如果个别出口商品的报价曾经一度偏低，那么，这种现象早已不存在了。况且，我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额是很少的，只占资本主义世界各国贸易总额的千分之五强。说这一点份额竟会“威胁自由世界的贸易”，这难道不是“一千零一夜”里的奇谈么？

中国人民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组织了民兵。这一点，也被杜勒斯用来恫吓中国的友邻国家。但是人们都知道，民兵只能是反对侵略的组织，而不能是侵略的军队。如果杜勒斯之流真的不懂得这一点，不妨去看一下美国自己的历史。在华盛顿

组织的民兵旗帜上，就写着“不能践踏我”的口号。这个正义的口号，正确地说明了民兵的性质。今天的美国侵略集团，到处去践踏别国的人民，因此它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也都会遇到打起了“不能践踏我”的旗帜向它发动斗争的人民。

很明显，看到中国将要强大起来，因而感到“不安”的，并不是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而不过是一小撮人，这就是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

原来帝国主义的规矩是，只有自己是强国，别人都应当是弱国，只有自己是工业国，别人都应当是农业国，是工业原料的供给地，至多具有残缺不全的一些工业。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根据这个规矩来安排它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也是如此。拉丁美洲各国的情形就是明显的例子。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有众多的人口和广阔的领土，但是在美国资本的控制下面，却只能成为供给农产、林产和矿产原料的国家，自己不能够生产足够的工业产品和机器，因而在经济上很难离开美国而独立。中国过去也是这样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虽然感到恐慌，一方面还是存着梦想：总有一天你活不下去，非找我们要饭吃不可。

中国的大跃进把这种梦想最后彻底地打碎了。

这样一来，就是说，中国将不需要帝国主义的任何“帮助”而成为一个工业的强国。帝国主义要想重新回到中国来，就是他们自己，也感到是根本不可能了。

而且据杜勒斯说，事情还不止此。他



不止一次地喊叫道：中国的“目的”是“要把我們赶出西太平洋地区”。这就是說，在这位頗有点远見的国务卿的心目中，已經从中国的大跃进中看到了美国侵略势力被赶出西太平洋的不妙的前景了。

美国是在太平洋东岸的一个国家。从太平洋东岸到太平洋西岸有五千海里。可是至少在六十年前，充滿野心的美帝国主义就已經把整个太平洋看成一個“美国湖”了。那时美国并吞了夏威夷，攫取了菲律宾，从此一帆风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太平洋建立一个“帝国”的欲望已經几乎实现了。

可是曾几何时，太平洋的波涛已經显然对美帝国主义者不利。美国的国务卿不得不惊惶失措地喊道：人家要把我們从西太平洋赶出去了。

为什么美国感到它在西太平洋站立不稳呢？这是因为，它想在西太平洋地区做支配一切的主人，它的刺刀在西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鼻子前面摇晃，它不顾各国人民的反对到处建立軍事基地，它和各国最腐朽反动的政治势力勾結在一起，压制民主、自由、民族独立的力量，它的所作所为已經引起了西太平洋地区的許多国家和人民为极端厌恶。这种情况，美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和资产阶级政界人士也早已看到和承認了。“多行不义必自毙”，既然硬要散播蒺藜的种子，它就不能不收获蒺藜。

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人已經成功地把美国侵略势力赶出了中国大陆。台湾是中国的領土，美国死賴着不走是不行的，总有一天，它非退

出去不可。对于西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要求美国侵略势力退出去的正义呼声，中国当然是坚决支持的。这就是我們得罪了杜勒斯之流的老爺們的緣故。

岂但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地为非作歹；同样地到处建立軍事基地，同样地勾結腐朽反动势力、压制民主势力，同样地在各阶层广大人民中制造仇恨，从而制造自己被赶走的局面。杜勒斯既然已經聰敏到能够看見他們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前景不妙，應該也能够看到他們在別的地區的同样的命运吧？

杜勒斯之流在咒罵中国的时候，企图造成中国人正在一般地仇視美国的印象，并且企图煽动美国人民敌視中国。但是大家知道，引起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要求自由和进步的人民的仇恨的，并不是美国人民，而是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反人民的政策。正如毛澤东同志复福斯特的信中所說：“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間的友好关系，終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中国人民紧紧地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团結在一起，和全世界爭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的国家和人民团結在一起，坚定地勇敢地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前进。杜勒斯之流的誹謗是損伤不了我們的，只是又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他們的穷途末路的丑态罢了。

更正：本刊今年第三期第八頁第六行“产联在一九四〇年”应改为“产联在一九四九年”。

